

【编者按】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特别是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震惊了全国民众，这些暴力事件的伤害规模和残忍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后续发生在不同地点的多起族群暴力事件更把中国的“民族关系”议题推上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学术研讨会、期刊杂志、网络博客讨论中，全国各界人士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导致中国民族关系恶化的症结是什么？今后改善中国民族关系的出路在哪里？”

由于民族问题已经与中国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直接相关，我们看到已经有许多其他专业背景的学者开始参与有关议题的讨论。有些学者深入少数民族基层社区开展调查研究，有些学者努力分析国外社会在处理种族/族群关系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有些学者系统分析历史上中国各朝代和民国时期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路、策略和效果，希望能够从现实社会、境外实践和历史经验中发现解决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而且努力在基础理论和研究范式方面有所创新。这些年来，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和思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也陆续对一些相关文章和研究报告做了介绍。学术界的这些讨论必然会对政府决策部门和施政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在2014年5月和9月先后召开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提法，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若干问题。

国外学者和政界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和可能的政策调整也非常关心，在许多英文杂志上已陆续刊登了多篇以中国民族关系为主题的论文。本期《通讯》向大家介绍的，是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主编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系列的第68卷，这篇研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族群政策：改革是否不可避免？》作者是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任教的美国学者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他多年关注中国的民族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这篇研究报告对中国近年来有关民族问题和政策的讨论进行了述评，并在文献梳理和社会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供国人参考的观点。美国东西方中心位于夏威夷，是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亚洲太平洋地区政治、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资深智库，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决策有重要影响，因此我国的政府部门也应当关注这一研究报告的内容与主要观点。由于发表于2013年，所以我国十八大以来在民族问题上的讨论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精神没有包括在这篇报告的内容中。

我们觉得这篇调查报告为中国学者思考国内民族问题及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视角。费孝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人看我”，意思就是通过了解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其实为我们认识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找到一面镜子，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当局者迷”的局限。当然，这篇研究报告也必然受到作者自身立场和知识体系的限制，我们在此介绍这篇报告也并不表示我们赞同其中的观点。“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想我们不妨看看这位美国学者是如何评议中国社会的民族理论争论和未来政策走向的。这篇报告由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尼玛顿珠翻译成汉文，由马戎校对定稿。如果翻译中有不准确的地方，自然由校对者负责。

（马戎）

【论 文】

中国的族群政策：改革是否不可避免？¹

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 Inevitable

美国东西方中心《政策研究》第 68 卷

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著²

尼玛顿珠 译³ 马戎 校

摘要：要在保证族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族群团结之间保持平衡⁴，这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面临的挑战。中国这个拥有庞大少数民族人口的国家，一直以来致力于这一微妙的平衡工作。尽管出现了一些系列性冲突，但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有相当的能力维持各族群间的张力，尤其是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之后。

但是有迹象表明，族群冲突很可能随着自由市场力量的加强而增加，族群交往和人口流动的增加也提高了族群之间的潜在竞争。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发生在拉萨（2008）、韶关（2009）和乌鲁木齐（2009）的血腥骚乱证明，共产党一直宣称的“和谐的族群关系”（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是虚妄的。实际上，一些中国民众已将族群冲突和暴力事件视为政策失败的标志。

在这一危机中，中国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思想领袖们参与了这场有关国家未来族群政策的空前讨论。新的网络平台以及传统媒体的商业化也使得对于这一话题的信息和讨论极具爆炸性，而这个议题在此之前曾经是人们缄口不谈的，在今天也依旧具有高度敏感性。

开展更多的研究，为的是找到兼具本土性和创新性的应对当前问题的答案，中国的思想家们正在寻找一系列新方法来处理族群关系。其中一些植根于中国传统，而另一些则基于所谓的国际通则。除了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支持增强少数民族权力和自治权以外，大多数中国思想家们都一致谴责群际凝聚力的缺失，并且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去维持当前中国脆弱的国家统一。

本研究参考了过去五年内中国国内关于族群政策的讨论。相关的争论是对未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族群政策的评估和预示。即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现有的观点看起来也显示出政府需要逐步反思现有的政策，并努力强化族群团结。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越来越感到，中国目前沿袭前苏联模式的“分而治之”策略，并不符合中国传统和国际标准。“熔炉”模式开始逐渐被接受，认为其将会更有效地淡化族群意识，促进族群关系并且更加长久地巩固国家统一。

在过去十年里，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已经引导了族群政策的改革。他的观点曾经一度被边缘化，如今他已经与许多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进行（超越族群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对话，探讨对于目前道路的担忧。尽管对于改革的具体设想，人们仍有很大差异，但是诸如汪晖和孔庆东

¹ 本文是美国东西方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组织出版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系列丛书的第 68 卷（2013 年出版）。统一书号：ISBN 978-0-86638-233-5。

² 作者简介：James Leibold 为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高级讲师，是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重构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作者（2007 年），共同编辑 *Critical Han Studies*（《批判汉学》）（2012）及 *Minority Education in China*（《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他关于现代中国族群、种族、民族主义的研究刊载在 *The China Journal*、*The China Quarterl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odern China* 和其他出版物中。

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⁴ 本文英文稿中的 ethnic policy, ethnic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ethnic autonomy 等词汇，在国内通常用语中对应的是“民族政策”、“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民族自治”等。由于 ethnic 在学术上的严格译法应是“族群”，nation 或 nationality 的严格译法是“民族”，考虑到作者对中国 56 个“少数民族”的理解和用词仍然是 ethnic groups（族群），因此在这一译文中把 ethnic 统一译为“族群”，特此说明（本文校者注）。

等左倾人士也谈及了开辟新道路的必要性，而自由派核心人物包括刘军宁、李大同和秦晖等人也对此表示赞同。

为了避免发生如同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国家内部族群分裂，这些学者提供了加强国家团结和归属感的建议。前沿的未来学家胡鞍钢近期呼吁“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一震惊学界政策建议对主流群体和少数族群都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尽管有许多支持变革的声音，但是党和国家依旧坚持说——起码公开地宣称——目前的政策依旧有效，而且任何族群关系的紧张事件都是因为外部干扰导致。同时，对于维持现状有深厚利益的关联者们仍在抵制重大的变革。

但是，仍有一些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士公开支持在族群政策中的新方向，并且期待新领袖有所行动。习近平有关“中国梦”的叙述，强调了国家团结和认同情感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族群政策依旧是胡锦涛及其导师胡耀邦的延续，并且似乎被他们的追随者和制定族群政策的权威集团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诸如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族群优惠的政策激变，在可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即使这些（持调整族群政策的观点的）政要人士仍在中共高层任职，但是改革族群政策的优先性相对而言并不很高。中国政治系统的复杂性也使得提出任何大胆的改革方案都有很大难度。中共政府对于政党稳定的持续追求也要求社会稳定，因此更有可能加大对于不安定边疆地区的维稳投入，而不是对主要政策进行变革。

即便如此，在习近平领导下，一些细微但重要的政策调整依旧被视为可能。这些政策调整包括取消第三代身份证上的族群身份（ethnic status），加强学习和使用中国的官方普通话，并且增加族群人口流动作为户籍制度改变的一个要素。

改革者（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大多同意变革必须逐步渐进开展以达成共识。任何对于当前政策的决定性变革，都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修正。这将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很多少数民族和国际社会眼中的声誉。但是，系统性的族群骚乱已经变得经常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可能被迫实行更多的根本性变革。

目录

1. 简介

范围和目标

2. 现行政策及已被觉察的缺陷

三个核心的政策要素

政策的缺陷

“中国的 9/11”：乌鲁木齐骚乱

理解当前的骚乱

3. 改革的议程和引发的不满

马戎关于改革的观点

第二代民族政策？

“代表现行民族政策体制集团”的回应

4. 测定公众意见：右派、左派、中间派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中国的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

更广泛的公众意见

5. 习近平领导下族群政策的方向

朱维群的“个人观点”

胡锦涛的遗产和个人变化

习近平的“中国梦”和族群政策

6. 总结性思考

参考文献

1. 简介

要在保证族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族群团结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直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挑战。当今世界的网络化联结被打上了“以身份为特征的运动”（identity-based movement）的标志，在这一运动中，以文化、族群和宗教差异为元素组成一些面目全新、有特色和复杂的国家/民族建构方案（state- and nation-building projects）（Castells 2010）。正如其他多族群国家那样，对于中国的党和国家来说，管理好族群关系一直是最重要的政策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独特的历史、地理和人口构成也在为中国人有关族群多样性的思想和政策勾画出一个文化景观。

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展现出了一个独特的民族（nation）形态，他将其描述为包括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形态的自觉意识是晚近才出现的，这一“多元而统一的结构”是“几千年来历史进程的结果”（Fei, 1988）。三千多年前，因为吸引和融合了周边的人群，中国文明的核心从肥沃的黄河流域开始向外扩张，如“滚雪球”（a rolling snowball）一样越来越庞大，它的扩展受到的仅仅是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其结果就造成了当今的中华民族——在中国人语境中，是 56 个各有特色、不可分割、理论上平等的族群集合体或“民族”（Minzu）。¹

然而，在现实中，中国多元文化之谜中的各族群的人口规模既非彼此相当，彼此间也并非必然相处和谐。在官方分类中，汉族占中华人民共和国 14 亿人口的 92%，为绝对多数，其余 1.14 亿人则属于其余的 55 个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他们被统称为少数民族：每个族群拥有几千至几百万的人口，他们聚居在中国资源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边境地区，人口散布在全国各地。

尽管有一些不间断的冲突，但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有相当的能力维持族群之间的张力，尤其是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但是，一些迹象表明这种控制正在变得不稳定，因为自由市场的力量加强了族群交流、竞争和流动。实际上，如 Nicholas Bequelin（2012）所言，随着在西藏、新疆、内蒙以及诸如广东、河南等内陆省份发生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暴力事件，过去 10 年内“最严重的”族群暴力事件毁掉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 10 年执政（2002-2012）。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的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思想领袖们就已经加入了一场空前（频繁发声的）对于族群政策的辩论。已发生的族群冲突和暴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政策的失败，随着为解决当前问题而开展的更多更具本土性和创新性的调查，中国的思想家正在寻找一系列管理族群关系的新办法。其中一些办法植根于中国传统，而另一些则基于所谓国际规范。

很多西方学者（Mackerras 2006; Barnett 2009; Sautman 2010 and 2012）一直支持加强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治。与他们不同的是，中国的思想家们则倾向于公开谴责群际团结的缺失并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去加强国家统一。然而，这些声音在中国外部很少被听到也几乎不被理解，同时，政府的宣传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也在塑造着西方社会对中国族群议题的许多认识。

¹ 汉文的“民族”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并已用于代替英语中广泛使用但却泾渭分明的众多概念（如 ethnic group, nation, nationality, people, 或 race）。在这项研究中，“Minzu”当其明确指的是国内正式承认的 56 个“Minzu”群体之一时使用的是“ethnicity”或“ethnic group”，而当其表示的是集体性的“中华民族”的身份时使用“nation”。具体 Minzu 在以前曾被译为英文“nationalities”，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ethnic groups”。（作者注）例如国家民委的正式英文译法曾经是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现已改为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校者注）。

范围和目标

通过对目前对中国现状评论的全面关注，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国内对于族群政策的各种观点。首先回顾了国内对于族群政策和关系的争论，然后探索了这些争论对于习近平领导下的未来族群政策发展方向的影响。所做的分析基于对整体中国社会公众评论（学术和大众的）的深入阅读，以及和中国学者及其学生们的非正式讨论。

为了建立可控制的讨论范围，本研究已经排除了非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地区的中国和西方分析家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中国关于族群问题的思考已经明显受到中国外部经验和声音的影响，并且人们也认为这些对中国有参考价值。本研究还提出了政策变化的任何可能性并参考了少数族群非精英人士的观点，尽管这些重要论题在发展研究和人权文献中已经得到阐述，但是在这里更需要有所涉及。

众所周知，中国的公共意见很难被精确地衡量（Tang 2005: 33-52），尤其是针对类似于族群政策之类的敏感问题。很少有中国人愿意坦诚和公开地与关心这类问题的外国研究者交流，并且大多的调查数据和问卷也完全避开族群议题。

然而，中文世界中关于族群问题的探讨范围已经在过去 10 年中急剧扩张。曾经受到限制的观点和议题如今可以呈现在中国充满活力的新媒体景观中。商业需求和新的平台已经制造了某种“信息爆炸”，而国家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去完全控制社会舆论（Shirk 2011: 2）。这类讨论大多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博客、论坛、商业新闻的门户网站，以及一些进步杂志上。

正如 William Callahan（2013）所说，这些对话为中国观察者和其他对中国政策感兴趣的人提供了新机遇。除了试图“窃听”政治局以及它的秘密对话这一曾经用在研究苏联克里姆林宫政权的过时办法，现在更多的努力被用来倾听“中国人在公共领域对其他人说些什么”（同上: 4-5）。Callahan 辨识出了一群“公共知识分子”（citizen intellectuals），他们在战略上立足于党、国家和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同时在讨论“多种不同的梦想、可能性以及中国的未来”（同上: 13）时，能够积极地探寻哪些讨论属于可被接受的限制边界。

跟随 Callahan 的研究，本研究试图从可获得的公共信息渠道来辨别当代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对于族群政策的态度，并且评价这些态度可能对国家政策造成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所讨论的那些备受瞩目的公民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影响，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塑造公共政策。

与中国人思想和表述中丰富而杂乱的文化争论相关联，这项研究同时也试图重构中国的族群政策。当下中国展现了一个极其丰富的思想混杂现象。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目前更多地鼓吹共产主义和本土知识的范式。很久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在为怎样为自己的特殊国情提供不同的思想（尤其是来自国外的）做出努力。在今日，则是对中国模式的探索，或者更近期的是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梦的探索。

正如 June Dreyer（1999）所提醒的，这种对于族群议题本土道路的追求很可能发生在一种“单一文化范式”中，这种范式对于团结的重视胜过了多样性，并且力图通过中国文化规范的优越性来转变族群文化的异质性。现在，很多当代的中国思想家相信，这种传统的世界观大致上与当前苏联衍生的族群政策以及西方理论和多元文化的实践都不同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革，中国国内需要在重新思考现行族群政策以强化族群间的凝聚力这一点上逐步达成共识。中国现在的思想领袖们让我们相信，新的战略需要恢复和继续中国三千年的民族融合的历史。总而言之，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的族群团结的“雪球”需要重新坚固，中国的思想家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办法来使之可以实现。

2. 现行政策及已被觉察的缺陷

现行中国民族政策植根于马克思列宁理论以及昔日苏联的经验。所谓族群问题，或更精确来说就是处理少数群体的问题，被视为是与“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律”（Connor 1984）相符的。现代性道路是线性的，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按照相同的速度发展。这意味着族群文化的差异仅在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之后才会消失。

为了防止多数群体的沙文主义，并且确保那些通常具有战略地位的少数群体的忠诚。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多族群的联邦政治体制框架内对这些少数族群提供保护和承认。在苏联，布尔什维克为非俄罗斯人的少数族群创造了一种独立民族形态（民族的文化、精英、语言和领土），最终创造了被 Terry Martin（2001）称作世界上第一个“肯定性行动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有些人断言中国是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的政策，然而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对民族问题的一些重要叙述进行了“中国化”（sinicize）。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终拒绝中国的少数群体以任何一种形式进行领土继承或者实行联邦制度。相反，由于占多数的汉族人口具有压倒性比例，他们选择了一种更具约束性的族群自治（ethnic autonomy）（Leibold 2007: 81-109）。至少在文本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各种对于少数族群社区的法律保护。在现行的 1982 年宪法版本里包括了：“自由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并具有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

这一做法标志已背离了中华帝国时期如何看待族群文化差异的传统观念。在正统儒家信仰中，差异是短暂并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伦理规范的学习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转型。“夷”“夏”之间的界限是易变的，并由文化（儒家礼仪与原始习俗相对比）和生态（农耕生活与草原游牧生活相对比）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现代意义的族群性或民族性来决定。

“夷”“夏”之间的边界在民众不团结或国力衰落时有可能会强化，夷（非汉族）会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本性和生活习气。但是始终存在一种规范的理想，即通过转变和融合，最终出现最终的统一：一个具有包容性与等级和谐的天下之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家赵汀阳（2005）认为，这样一种“天下”的状态（国家）表明了中国传统，并可以作为未来全球治理的模式（Callahan 2013: 52-58）。一种间接的统治策略，诸如帝国时期的羁縻或土司政策以及当下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针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和族群区域自治的实践，都被视为短暂的权宜之计，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最终将会消除族群文化的差异（Leibold 2007: 19-24）。

三个核心的政策要素

相比之下，至少在理论上，当今中国政策的前提是维护族群多样性以及在国家引导下的渐进发展，即允许各民族按照自身条件，根据自己的节奏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

政策管理系统包含内在相互联系三个要素：“民族识别”（the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民族区域自治制度”（a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以及“民族优惠政策”（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minority-treatment policies）。尽管这些要素从未被完全地实施，但是在这一政策架构领导下的族群多样性在中国被正式讨论并在目前仍在实践，只是在大跃进（1958-1962）以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有所削弱。但是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这一套架构得到了加强并加以制度化。

政策的执行需要党和国家首先确定中国族群的数量，以便使他们在国家生活中能得到全面地保护和代表。在 50 年代初期，北京（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派遣了一批人类学家对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少数族群进行识别、分类并加以记述。其结果是由官方认定的少数族群的数目不断增加，直到 80 年代初期，这个数字才稳定在 56 个（Mullaney 2011）。

尽管这些分类在早期并不能显示这些社群是内部同一和自我归类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程序却使其制度化，并固化了这些标签在中国公民日常生活和心灵中的重要性。现在，中国居民

在个人身份证上清晰地标注了他们的族群类别 (ethnic category) 并且所有官方文件都需要包含这一信息 (Gladney 2004)。

少数群体大量聚居的地区被赋予区域自治的权利。这项权利首次被载入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并在 1984 年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成为国家法律法规。根据少数民族社区的规模大小和人口密度, 国家创造了多种不同行政级别的少数民族自治单位。这些自治政府被准许 (同样是在理论上) 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去诠释、调整和实施国家政策, 这些政策可能包含了旨在保护多样性和促进平等的特殊规定的延伸。截至 2005 年, 超过 71% 的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在超过 1300 个自治单元中, 这些区域覆盖了中国 64% 的领土面积 (Huang and Zhang 2007)。

自 1949 年以来, 无论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 中国共产党也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非汉族居民所享有的特权。在今天, 这些政策包括了在就业、高等教育、政府公职方面的优惠, 在一定程度上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 减免纳税, 以及保护和使用自己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的权利 (Mackerras 2003; Sautman 2010)。

比如, 在教育领域, 许多少数族群学生在全国高考中获得加分, 并且在高校注册时获得学费减免和生活费补助。在司法判决上, 少数民族犯人通过“两少一宽”(“少捕少杀”, 在处理上一般从宽) 政策可以获得更多的宽大处理, 但是, 对于任何被认定是反国家的或者是颠覆性的行为都将严惩不贷。

最终, 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 (通过中央财政和地区对口支援项目)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009 年, 5 个省级自治区的年度总预算中补贴比例已经从 29% 上升至 94% (Ma 2010: 10-11)。以西藏为例, 自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已经收到了近 14 亿美元的中央公共财政经费支出 (Ma 2010: 10-11)。

政策的缺陷

尽管有来自国家政权的促进和保护, 但是少数民族 (在总体上) 依旧在几乎所有发展领域上明显落后于他们的汉族同胞, 包括教育、健康、福利指标和收入。这在乌鲁木齐和西藏的乡村地区尤为明显。

中央财政转移令人鼓舞地促进了边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依旧生活在边缘和受贫困折磨的乡村地区。在超过 50% 的官方认定的贫困县的农牧业地区, 生活着大规模非汉族人口 (Zhu and Blachford 2012: 725; Freeman 2013: 18)。尽管西藏自治区的出生预期寿命在 1949 年之后几乎翻了一番, 却依旧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8 年 (Xinhua 2011b), 而且比新疆的维吾尔族也要低 12 年 (Mackerras 2012: 500)。Bhalla and Luo (2013) 最近的研究发现,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获取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方面仍然存在巨大鸿沟。

然而停留于那些过于概括性的结论是存在危险的。许多少数族群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西南地区的族群, 已经从当前的国家政策中受益良多, 也和汉族产生了亲密感情。但是, 目前的做法却未能成功地在维吾尔族、藏族社区的核心区域中培育出国家归属感, 在较小的程度上, 在一些回族和蒙古族当中也是如此。

通过以加速的方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中国共产党现在宣称拥有五百万少数民族党员, 占全体共产党员人数的 6.6% (Leibold 2012)。其中一些个体诸如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或国务院秘书长杨晶 (两人都是蒙古族), 都已经在权力机关拥有了重要的地位。但是, 其他很多人只拥有仪式性的职位而没有任何实权。

比如说,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中只有 10 名少数民族成员 (4.9%), 这个数字是 1973 年以来最少的。自 1949 年以来仅有 4 位少数民族成员进入政治局, 而在政治局常务会中都是汉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各自治单位的行政首脑必须选自以该族命名的少数民族, 但是这样的行政职位还是要服从掌握实权的汉族党委书记 (Cheng L. 2008)。

中国社会内部的非汉少数民族的地位，受到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相对比例的影响：少数民族就像分散洒落的油滴落入了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而汉族人口（包括军人、警察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已经构成除西藏之外所有省和省级自治区人口的大多数。自 1949 年以来汉族人口的迁移活动（国家推动以及自发的）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族群地理分布空间。这使得非汉族文化发展的空间日益萎缩，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代表性的表达变得公式化和空洞。汉族社会的绝对规模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不断受到威胁。

在一个更加开放、推动自由和市场导向的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党和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维持稳固的族群关系和促进群际和谐。到目前为止，其最有效的工具便是维稳：封锁和严控麻烦来源，控制（有时切断）通讯，并在群际接触和流动方面设置体制性障碍。

在此背景下，目前族群政策的批评者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在国家指导下进行族群整合，而不是继续使之孤立和进一步边缘化。这些批评者主张回归和重新锻造大一统（Grand Union，“大同”），即把多样化的族群文化融合进一个单一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实体中。

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2009 年 7 月发生在乌鲁木齐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是对于大一统国家所面临危险和改革的紧急迫切性的有力警示。

“中国的 9/11”：乌鲁木齐骚乱

2009 年 7 月 5 日的夜晚，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爆发了一系列流血事件，这一位于边远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经历了几十年以来最致命的群体暴力冲突（Millward 2009）¹。对于许多中国公民来说，7·5 事件就是“中国的 9·11”：一场来自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场袭击最终导致了“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对于平民的血腥残害和屠杀，受害者甚至包括仅仅 6 岁的儿童”（Li H. 2009）。

然而现有的证据描画出了另一幅不同的图景：即一种自发和狂乱的族群暴力骚乱，是一场街头斗争中维吾尔族针对汉族的暴力骚乱，同时警察力量控制局势的努力并不成功。

这场骚乱的起始是上千名维吾尔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进行的一场平静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对在此之前发生在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的严重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在汉族员工听到一名女汉族员工声称被强奸的谣言后便开始胡作非为，导致了两名维族员工死亡，上百名维族员工受伤（许多重伤）。在社会媒体的推用下产生了更多的谣言，照片和视频证据似乎显示了更多的死亡人数，由此许多维族一同在乌鲁木齐抗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准确的细节始终未被缕清，因此起初平静的抗议最终变得后果可怕。

当夜幕降临后，这座城市便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剧场：四处行凶的维吾尔族青年手持刀具、管子和临时制作的武器，寻找并且屠杀无辜的汉族平民（或者是那些被认为是汉族的人）。上百辆机动车、商铺被抢劫，当政府的治安力量艰难地试图掌控局面时，他们便开始纵火。在整个夜晚和第二天依旧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随后治安人员包围了上千维族居民，与此同时，汉族治安人员在上街保护自己社区的同时也对维族不法分子施以报复。

为了试图恢复控制，地方当局封锁了整个城市，切断了网络和电话通讯，同时上千名武警人员占据了整个城市的要道和其他区域中心，以防止出现进一步的冲突。国家主席胡锦涛离开了在意大利召开的 G8 峰会，回国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访问了新疆。官方消息宣称有 197 人（其中 134 人被称为“无辜的”汉族平民）在暴乱中丧生，1721 人受伤。其他一些消息则声称实际死亡人数则远远高于官方说法，甚至有可能接近一千人（Carlson 2009）。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7·5 事件证明了当前中国族群政策的失败。尤其是将之和其他一系列的族群骚乱联系在一起，比如 2008 年 3 月 14 日发生在拉萨（“3·14 事件”）和其他藏区的

¹ Roland Soong 曾在http://www.zonaeuropa.com/20090706_1.htm汇集了中外媒体有关“7·5 事件”的报导。

骚乱事件；2011年5月发生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抗议；以及在2012年3月之后发生的上百起藏人自焚事件。

不同于以往少数示威者冲击国家治安机关的事故，在拉萨、乌鲁木齐和韶关事件中包含了对于汉族民众和他们商业场所的残暴袭击。正如 Sautman (2010: 52; 2012) 证明的，这一系列事件“对于在中国生产族群政策的国家话语有巨大影响”。暴力事件的等级和凶残程度震惊了大多数中国人，并强化了多数群体的刻板印象和他们对挥舞着尖刀的藏族和维族“野蛮人”的恐惧。尽管持异见的艺术家艾未未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孔庆东都不同意这种印象，但是他们都共同指责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族群政策造成公众的紧张，声称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去维持和谐的族群关系。

理解当前的骚乱

中国共产党至少在公开场合依旧宣称自己的族群政策仍在有效地发挥作用。西藏自治区前任主席强巴平措宣称：“在全世界都难以找到像我们一样的族群政策典范。”(Chen 201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在总结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时提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的十年，见证了中国各族群的长足进步……(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并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Leading Group of the SEAC 2012)。这些描述展现了一个多彩和谐的美丽图像，就像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时56个儿童手持国旗穿过鸟巢体育场。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说法，任何族群关系紧张的事件都是因为受到那些试图煽动分裂和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分裂分子及其境外支持者“外部干涉”的结果。2009年中国共产党在七·五事件后颁布的民族政策白皮书中自信地宣称：“新中国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国务院，2009)。一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官员告诉记者“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事件对于中国的民族政策并无影响，”因此在政策上也不需要方向上作任何改变 (AFP 2009)。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高层之外则很少有人同意这个观点。公共知识分子领袖朱学勤对政府应对7·5事件反应的总结认为是“鸵鸟式的(逃避现实的)表态”。将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中国政府已经看不到它族群政策的落后也已经无力阻止族群冲突 (RFI 2009)。香港极具影响力的《东方日报》(Oriental Daily 2009) 宣称，暴力中产生的困扰清楚地表明，族群矛盾“炸药桶”已构成一系列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而政府“盲目的绥靖政策”则越来越过时。

在一次3·14之后的采访中，艾未未(2008)断言“这次骚乱证明了在任何层面(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都已经失败了……过去我们汉族拆毁了他们的寺庙，现在他们毁坏我们的房屋并攻击我们。”与此相似，孔庆东(2011b)认为族群关系是当前中国五个潜在的绊脚石之一，为了替代当前的政策，他建议“在新疆发展像重庆一样的活动，唱红歌和打击贪污腐败，这样新疆各族民众能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并和全国人民一样忠诚。”

自8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极少有个人超越族群和意识形态分野来如此公开地讨论中国族群关系是否健康发展这一议题。这一敏感并通常隐秘的话题自2008年以来已经引发了强烈的争论，其中大多数讨论都是围绕着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提出的有争议的观点而展开。

3. 改革的议程和引发的不满

近十几年来，马戎一直在质疑当前党与国家族群政策的有效性。他一直呼吁开展渐进但紧迫的政策调整，以预防潜在的国家灾难：即中国发生以领土-族群为单元的分裂。马戎出生于学术世家，是回族革命老战士马寅之子，马寅在1991年去世之前曾是国家民委内部有影响的学者并参与制定政策。

马戎的学术事业受到了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培养和支持，费孝通恢复名誉后在1985年成为北京大学新建的社会学所所长。1987年，在美国布朗大学 Sidney Goldstein 教授的指导下，马

戎完成了有关中国内蒙古赤峰地区族群迁移与整合的博士论文，随后他成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的教授、所长和社会学系主任。

作为思维严谨和有经验的学者，马戎致力于对中国族群问题使用特有的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马戎受到现代化理论以及社会学先驱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深刻影响，马戎经常引用诸如 Nathan Glazer, Milton Gordon, Daniel Moynihan 以及其他美国族群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些社会学家对于美国民权运动中觉醒的族群意识的日益高涨深感焦虑。与这些学者相同，马戎在今天可能被冠之以“新保守主义者”的头衔，但是他关于认同身份（identity）的观点反而可以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更加接近。自 John Stuart Mill 之后，这样一种思想强调个人高于群体权利的重要性，并将族群文化的身份认同（identity）视为个人事务，并不适合于被国家加以政治化（Barry 2001: 112-54; Sautman 2012: 18）。

马戎宣称“现代的、法治的公民国家”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Ma 2012: 68），此种线性的、目的论的、世俗性的观点深深根植于现代中国思想中（Duara 1995），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在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文明教化工程”（civilizing project）的基础（Harrell 1995）。然而对于马戎而言，他人所言的“汉化”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接受现代、普世性的规范已是自鸦片战争（1839-1842）后在中国各地便已经发生的现象，尽管中国各族群当中发展的速度有所不同（Ma 2012: 254-263）。

改变了喀什和拉萨地貌景观的新高楼并非是“汉式建筑”，而只与全球其他地区办公大楼相似的、加固了钢筋水泥和玻璃窗的现代建筑。同样的现象是现在无处不在的西式服装。在马戎看来，作为进步和现代文化的“先驱”，汉人只是在较早的时间就简单地接受了这些“西式”风格，并且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全球化的规范会传遍少数民族社区和边疆地区。但是，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一致性，马戎一直坚持要保护中国的多元文化遗产。

马戎认为，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政策。他一直坚持认为政府的现行政策与国际规范以及中国传统之间越来越脱节，因此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多产的学术成果、多年坚持不断的呼吁，以及大批学生和拥护者的支持，马戎曾经被边缘化的观点如今已经大量出现在当代中文世界关于族群关系和政策的讨论中。

马戎关于改革的观点

什么是民族？马戎的分析是从这一概念的分析开始的。中文中的“民族”一词目前被广泛而含糊地同时指称中华民族整体及其下属的 56 个民族。马戎认为，这不仅导致了语义上的混淆，还使得族群身份被禁锢在死板而固化的国家框架中（2012: 3-6）。

在英语当中，nation 和 ethnic group 这两个概念具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当前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公民-领土单位，而后者则是指一群享有共同文化（风俗、语言、宗教以及/或地域）、但是生活在一个或多个民族（国家）中的群体。如果中国的族群与中华民族处于同等层次，那么，他们就应该被赋予“民族自决”或者独立的权利，就像一些西方观点一直坚持的那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戎提出了“族群”这一新词汇来称呼中国内部不同的族群社区，同时又保留了“民族”这一概念来表示整体的中华民族。严格来讲，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社会而非一个多民族国家。马戎宣称，这一具有混淆性的词汇，反映了中国自 1949 年以来“民族构建过程”（nation-building process）的整体性弱点。

正如内战时期的美国，当代中国是一个被内部分割的大厦。马戎认为（2012:168-191），在中国由族群关系导致国家碎裂的风险是目前国家“最大的社会问题”。通过一系列善意但是最终属于误导的政策，党和国家无意间创造了两个中国：汉族的中国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以教育系统为例，现行教育系统被分割为“普通学校”和“民族学校”，前者专为汉族学生开办，而后者则可以使少数民族的学生用母语完成小学至大学的学业。民族学校保护了语言和文化，但是把少数族

群学生与主流社会分隔开来。

按照马戎的观点，其结果便是少数民族学生没有熟练地掌握普通话，难以在市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在文化领域，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节日庆典、电影、体育竞技项目以及电视节目，但是在主流社会的娱乐活动中却极少呈现族群文化多样性。因为害怕冒犯少数民族的敏感神经，汉族导演和演员避免涉及少数民族主题。马戎认为，这一汉族/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放大了族群文化差异、增加了社会冲突并导致了双方之间普遍缺少互动和相互的理解。

这种社会凝聚力的缺乏表现在人口统计资料上。马戎和他的同事们强调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存在相对较低的族际通婚率，尤其是在汉族和具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之间（Ma 1999; Li X. 2004）。这反映出的一个事实，即汉族和少数民族——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依旧生活和工作在各自区隔开的社区而且仅保持有限的日常接触。

尽管马戎指出美国民权运动前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具有负面影响，但他很小心地使用“族群区隔”这一术语而避免使用“种族隔离”。其他回应马戎观点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民族制度“以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的族群隔离”在发生作用，这 56 个民族就像彼此分离的“竹竿”或者“小国家”（Wenrui 2008）。对于马戎来说，在中国社会被深刻区隔开的场景中，“民族”群体的行为就像是部落集合体（tribal collectives）（Ma 2012: 68）。

马戎和其他学者认为，这样一种区隔是学习前苏联族群政策的产物。因为盲目地跟随前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中国共产党背离了“中国的传统道路”，即群体身份是在一个“文明-野蛮分野的连续统”上被动态地加以标识的，各群体通过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而沿着这个连续统移动。

与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身份认同”或“普遍性”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苏联模式的政策通过对群体进行识别和分类把族群加以政治化，然后再通过区域自治体系和族群优惠政策来强化这些差异。“这种把族群加以系统性的体制化，制造了不同族群成员们之间互动和融合的制度性障碍，”马戎写到（2007: 211），并且“会一直提醒他们，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群体’。”

对于马戎而言，这种做法和美国对于身份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美国宪法赋予的是公民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权利，防止对于族群身份的政治化，并且鼓励超越族群界限进行更频繁的互动、通婚、混居。中国应该学习这种经验，并且对族群事务“去政治化”，以此来巩固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Ma 2009b; 2012: 16-19）。

马戎争辩道，如果政策不进行改变，中国有可能重蹈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覆辙而走上国家分裂之路。这两个国家因为“错误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最终分崩离析。中国也必须在“和平时期保持警惕”，必须认识到发生在乌鲁木齐和拉萨的暴力事件就是“清晰的预警信号”，否则在“一种相似的制度设计”下，中国也可能会重蹈类似的命运，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领导人们都坚持宣称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苏联人民”已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然而，当机缘成熟时，整个国家大厦便崩塌解体，使克林姆林宫的观察家们惊讶得发呆。根据马戎的说法，中国也拥有国家分裂的同样三个先决条件（族群意识、族群领袖、族群领土），并且在“反华势力”持续鼓动族群分裂的状况下，中国除了采取行动之外别无选择。“在目前”，马戎警告式地断言：“在 21 世纪，中国面对的最大的危险便是国家分裂”（2012: 224）。

对于马戎所描绘的苏联和美国“模式”之间率直的对比，在解读方面还有讨论的余地，对于这种反差，也许马戎有所夸大。首先，他夸大了族群问题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Sautman 2010: 91-95）。此外，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Naughton and Yang 2004; Mackerras 2006; Shambaugh 2008: 161-181; Sautman 2010: 91），没有联邦主义的政治结构以及汉族在人口上的支配地位使得中国的族群或领土分裂缺乏可能性。最后，中国国内的安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诸如维吾尔族等少数群体去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Bovington 2010）。

与此同时，马戎对美国社会持有一种明显的过于理想的看法。譬如他曾经说：“在过去的三

十年里，美国没有拍摄一部只能看到白人演员的电影”（Ma 2012:185）或者“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确实在‘民权运动’之后在实现种族关系和谐方面获得了成功”（Ma 2009b）。这些论断明显地忽视了目前正在美国发生的族群偏见甚至是暴力事件。

那么，马戎主张进行哪些特定的政策调整呢？在使用中文写作时，尤其是在大陆的刊物上，他的措辞比较谨慎。但是在一些英文出版物上（很多是较少人知的刊物），他建议一个新的政策方向，即随着时间推移应该淡化目前基于“民族”的群体意识，并且逐步用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进行替代。

扶持少数族群的政策应该继续，但是这一政策的对象应该逐渐从“少数民族所有成员”转变为贫困地区的“所有居民”，然后再到“所有需要被帮助的个体公民”。同样的，自治地区的行政机构应当保留一段时期，但是这样一种“民族领土”的概念应该被逐步淡化。在自治区域内，学校的双重体系仍应继续，同时，多种类型的双语教育服务应该向所有少数族群成员提供。中国社会中的族群分层现状应该得到系统化的研究，并且政府应该设立项目来帮助处于在语言和其他技巧方面处于劣势的少数族群成员（Ma 2009q: np）。

马戎特别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优惠政策，并且认为应当从“群体优惠”转向“个体扶助”。根据马戎的观点，群体优惠政策只应是暂时性的做法并且将越来越与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原则冲突。这种政策在很多少数族群社区培养出一种依赖文化，导致竞争力的缺乏，而且已经在多数族群中引发一种危险的反弹和愤怒，尤其是在新疆的汉族大社区中。

马戎支持在这些地方设立一系列“区域支持政策”（2011: 119, 123）并致力于“协助和促进各族群的劳动力交叉流动”，以实现最终创造一个“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日益增长的汉族和少数族群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继续在援助边疆地区上起主导作用，但是这样的政策应该抛弃对族群身份为标准，而代之以有需要的区域和个人为目标。

马戎很清楚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从而在少数族群和多数群体之间达成共识。但是对他而言，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代族群政策？

马戎已不再是呼吁族群政策改革的唯一声音了，他的观点越来越多地在学术圈及互联网的文章中得到回响，并且现在也被一些高层党政官员分享。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同时无疑也是最具争议和潜在影响力的要求变革的呼声，来自于未来学家以及政策顾问的领军人物胡鞍钢。在 2011 年底他呼吁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这一政策将减弱族群的“民族认同”并强化单一和共享的“国族认同”（Hu and Hu 2011）。

很明显受到马戎观点的影响，胡鞍钢提出了第一个系统的族群政策改革议程，这一提议在学者和政策专家们当中引发了如搅动蜂巢般的激烈争论。

胡鞍钢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创始人，这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克林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把胡鞍钢描述（2011: xv-x1）为致力于中国崛起及其相关问题的最具想象力和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意识形态方面，胡鞍钢经常被描述为左倾的，因为他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和管理社会事务，但是他的观点（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相似）是折衷主义的，而并非彻底的民族主义者。

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由胡鞍钢建议的至少七个主要的政策改革，族群政策将会是下一个吗？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随后在诸如《求实》、《学习时报》等核心党政杂志刊出并在国内网络广泛传播并引发讨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鞍钢和他在清华大学的同事胡联合讨论了一个新的主要政策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2010 年初召开了西藏、新疆工作座谈会，二胡认为，这些座谈会提出了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关注，这句话多次出现在胡锦涛在两次会议的演讲中。对于在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的这两次闭门会议上究竟讨论了什么，我们毫无所知，但紧随着近期发生的族群暴力事件，现行的族群政策肯定是激烈争论的焦点。至少在公开场合，这两个会议发出的要求大同小异：为促进这两个边疆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将投入更多的国家资金和优惠政策，以解决被认为与当前骚乱相关的民生问题。（CECC 2010a; 2010b）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年度工作报告标志着一个与往年不同的重要变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 2010 年 3 月（时间是位于西藏和新疆这两次工作座谈会期的中间）温家宝宣读的工作报告中，甚至没有仪式性地提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是强调“加强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教育”来“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说法（Xinhua 2010）。但是，这一提法又出现在随后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¹。2010 年的这一提法的缺失似乎展示了政策的新方向或新论调，二胡等人迅速捕捉到了这个信号。

在他们的文章中，二胡警告存在两种危险：“地方民族精英”（regional ethnic elites）和“地方民族利益”（regional ethnic interest）。他们认为在诸如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控制狭隘族群意识的失败已经提高了族群分离主义的威胁，同时提及了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批评中国侵害少数民族人权，而另一方面又在本国推动他们自己的民族政策以追求族群融合。

在他们眼中，中国面对的选择是严酷的，要么就是继续实施前苏联“大拼盘模式”的族群政策，并承担前苏联同样的命运；或者是向国际标准的“大熔炉模式”转变，这一模式在巴西、印度、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

在大熔炉模式下，文化多元性被接受并且个人被允许维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但是把族群区别对待的制度、法律以及特权的消失，将会鼓励一种自然的族群混合，并且共享公民归属感。为锻造一种中国自身的“熔炉模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聚力，二胡概述了一系列大胆的政策建议。

首先，在政治上消除族群差别对待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对待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这应该包括全国领土行政区划体系的调整以提高市场效率；消除官僚体制的障碍；并根据族群混合程度、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建立一个国土治理的更平衡的体系。国家的优惠援助应该是基于相对的贫困状况而不是族群身份，并且应该从身份证、工作和学校申请表及其他官方文件中取消族群标识。

第二，在经济方面采用新方法去促进少数族群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和联系。无论是从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社会福利）上，这些边疆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现在需要进一步消除制度性障碍以实现资金、货物、信息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升竞争力、创造力和创业的主动性，并且减少低效和区域差距。

第三，在文化层面更加重视将不同的族群传统整合为统一的公民文化和公民身份。这将需要提高国家通用语在口语和书面上的使用，防范宗教极端主义，更多地关注培养国家身份/认同的公民仪式，通过宣传和媒体的努力以实现这些目标。

第四，从社会层面来说，增加人们跨越行政区域边界的流动，以便与全球化、现代化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的发展速度保持同步。中国族群分类体系的僵化使得有才能并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成为

¹ 随后几年的每个工作报告中（2011-2013 年）均包含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或“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这种表达。

中国公民的外国人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加速外国移民不仅能使中国在现代化中受益，并且能够减少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的假设，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更具活力、包容、底蕴的社会。最终需要新的方法去提升族群的流动性、混居以及通婚，促进普通话、双语教学以及多族群学校的建立。

“代表现行民族政策体制集团” 的回应

对于当前影响渐增的改良主义观点最有力的反驳之一来自可以被称为“代表现行民族政策体制集团” (*minzu establishment*) 所做出的强有力的公开回应，这些机构以及个人都与中国庞大的民族官僚体制相联系。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数众多的“学者官员”集团，他们通常支持维持现状，尽管在私下有可能不同意现有政策的某些方面 (Goldman and Cheek 1987: 3)。在 2012 年上半年，来自全国的族群研究机构召开了多次论坛，对“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呼吁展开批评。

2012 年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举行了其中一场会议，这场会议邀请了来自不同的民族机构 (*minzu institutions*) 的 40 多位专家，据报道聚集了包括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代表 (Liu L. 2012)¹。在这次会议当中，胡鞍钢以及其他改革者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与会者指责那些呼吁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人“从来没有深入地学习中国的民族政策和中国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

一些与会者警告，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政策和制度” (而非“具体政策”)，“在政治层面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是危险的。”“超出基本政治框架”去讨论族群问题可能会导致“意识形态混乱”，甚至引起“重大政治动乱”或者是“突发事变和冲突事件。”与会学者指出，整合并不会导致同质性，并且强调人为和鲁莽的“强制同化”将会颠覆合作、团结和信任，而这些是解决中国这样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族群问题的核心。那些寻求改变现行政策的人被称为是极端的左派，或者是追求纳粹模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政策的伪法西斯分子。

与这次的会议一样，在 2012 年 4 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另一场专题研讨会中，与会者同样支持现有的正确政策，并且给改革议程贴上了“草率和不明智”的标签 (Wu 2012)。这一系列论坛的结论是，尽管一些个别的“完善”是需要的，但是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目前的道路最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这些会议当中没有人被点名批评。但是诸如“第二代民族政策” (即胡鞍钢和胡联合) 以及“去政治化” (即马戎) 这些隐喻的词汇被使用来谴责对现状的质疑。二胡还未公开回应，但是马戎在 2013 年 1 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以说明他和二胡的差异并再次澄清自己的立场。

马戎首先肯定了他们 (二胡) 对于这场争论的贡献——指出在狭隘的“民族”研究圈子外其他学科观点所具有的价值，但是他同意现在论及“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时机尚不成熟。中国需要一个更加渐进和谨慎的道路，直到在少数民族精英中达成了要求变化的共识，同时需要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及在中国广袤国土上地区发展速度的差异性。在中国这样广大而又复杂的国家，实行“一刀切”或者追求“大跃进”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嘲讽那种类似于毛泽东式的教条主义即过去被称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认为在今天，则是不允许个人去质疑现行的族群政策也不准去探索新的思路。

对于这一改革议程进行最严厉的理论批评，来自于高度受尊重和具有影响力的蒙古族学者郝时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 (国家部级干部) 之一以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同时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的丈夫)，郝时远代表其身后的“代表现行民族政策体制集团”发言。

在 2012 年初的两个多月里，郝时远执笔写了 4 个长篇评论文章 (总共超过五万字)²。引用了

¹ Robbie Barnett 感谢本次会议并且提供了此进程的英文摘要，所有的引用引自其英文翻译，但是因为都已经根据目前 <http://iea.cass.cn/content-BA0810-2012031609383390681.htm> 提供的中文原文进行校对。

² 郝时远的论文和其他反对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文章已收录在 www.mzb.com.cn/html/Home/folder/292573-1.htm

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胡锦涛的著述，他强调要实现实质性平等的重要性，而非仅仅是形式上或者是法律上的平等。郝时远还强调了这一改革议程的非法性，指出那与宪法规定的真正平等相违背。

郝时远提出的很多批评都针对马戎和二胡提出的对于国际经验的选择性解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在近期对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大讨论中，对于现行主流族群政策辩论的核心却是如何借鉴外国模式，这似乎极具讽刺意味。与此同时，那些对于前现代时期中国有关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则仅仅局限于一些非常专业的学术出版物。

比如，郝时远提出大量证据表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族群因素无足轻重，还令人印象深刻地讨论了那些依旧困扰巴西、印度和美国的持续性族群冲突。但是，郝时远（2012）也表达了他个人对于美国“熔炉模式”的赞赏，因为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锻造强烈的国家认同。但是郝时远强调说，作为一个非移民国家，中国具有不同的国情。他也并不反对那些改革者提出的所有观点，对于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分类项目可能有助于减少族群歧视现象的观点，郝时远表示同意。然而，郝时远在整体上支持当前的体制，认为这些现行政策依旧发挥作用并且应该延续下去。

其他的一些属于“代表现行民族政策体制集团”的学者，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学者也在质疑当前政策的某些方面。他们中有些人已经私下向作者表达了他们对于改革议程部分内容的赞同。其中一些人公开批评当前制度阻碍了共享的互动、理解和集体归属感的形成。

但是很多年轻学者同样也担心任何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当这些政策极其敏感却又难以掌握时。他们认为胡鞍钢和胡联合提出的改革非但不会减轻反而还会加强族群紧张和冲突。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专制政治文化、人口和地理空间的不平衡以及薄弱的法律制度时，人们会有特殊的顾虑。

这些年轻的学者更倾向于完善而不是调整现有政策。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他们认为可能更加审慎的提议，包括加强族群之间的对话和调解，鼓励在族群身份之间使用连字号（如藏裔-中国人，Tibetan-Chinese），扩大公民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规定所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使用双语，以及试行自下而上的少数民族自治管理，给予地方官员真正的权力（See Jia, Lee, and Zhang 2012; Carlson 2009; Guan 2007: 279-323）。

在最近几年中，这一辩论已经越来越面向公众。在2008年以前，马戎的观点通常只出现在摘要或者是一些鲜有人知的学术著作或者杂志中（cf. Hao 2005; Sautman 2010: 79），如今马戎的观点已是族群政策改革对话主流的组成部分，出现在主要的报纸、党政杂志以及网站中。¹

“代表现行民族政策体制集团”的人数十分庞大。超过500万共产党员还有另外过百万的就业岗位直接或者间接地和现行的少数民族群体体制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考虑政策惯性的话，这些因素也保证了对于现有政策的强有力的捍卫。

有一些学者提到诸如在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干部已经成为新贵阶层。这些党政官员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族群社区，转而依靠共产党和现有的族群制度（Gongmen Law Research Center 2009）。

“这些官员，”藏族博主次仁·唯色提到，“都是吃‘民族’饭的。如果民族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化，将会给他们的利益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他们会试图阻止任何对于民族政策的调整”（cited in Ye B. 2009）。

4. 测定公众意见：右派、左派、中间派

¹ 比如，详见网站 <http://www.mzb.com.cn/html/Home/node/292573-1.htm>;
<http://cnpolitics.org/2012/09/cn-us-su-ethnical-policy>; or <http://cnpolitics.org/2012/05/56-ethnic-groups/>

那么，社会上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策团体，尤其是那些并非“代表现行民族政策体制集团”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族群政策改革的议程又是如何看待的呢？Barry Sautman 认为，“限制少数民族权利”的这一提议“来自于很少数的中国学者”但“反映了在反思族群政策时的严重困境”（Sautman 2010: 72; 2012: 26）。除了这些观察，Sautman 还察觉到在近期的骚乱之后，2012年初，政策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标志便是在诸如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以更多民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做法去“改善民生。”

西方以及海外华人媒体对于新一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有许多的猜测。基于他父亲据说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并且传闻他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徒，一些人认为习近平“可能采用更为改良主义的方法”，并追随他的父亲“支持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Lim and Daniel, 2012; cf. M. Liu 2012; Hong 2012）。

西藏问题专家 Robert Barnett 同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认为在新的领导下会出现“一种更加温和的做法”（Schiavenza 2013）。Barnett 一直认为，西藏政策至少在任何时候都是派系政治中博弈的“谈判筹码”（M. Liu 2012）。

在一些未被证实的报告中宣称，在青海（也许还有四川省）的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放松对一些寺庙谴责达赖喇嘛的要求（RFA 2013; ICT 2013）。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便预示着政权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做法。然而在这一阶段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政策是更加温和的政策的前兆，还是面对藏区越来越高的自焚率而采取的稳定和控制的新措施。

正如下面的评论试图证明的那样，当涉及族群团结时，高层意见并不显示出温和的趋向，同时几乎没有公众支持加强少数民族权力和自治。公众意见似乎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需要提高族际凝聚力和族群融合，同时采用可以加强共享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不是强化狭隘族群意识的政策。这种观点跨越族群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并且增强了最终政策向这一方向调整的可能性。

在很多核心问题上，评论观点仍然被分成左派和右派：自由主义者主张为了发挥自由市场机制应该进一步消除国家控制，而左派观点则认为在中国这一地域辽阔、国情复杂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然而，二者都具有一种被 Gloria Davies（2007: 15-57）描述为超越意识形态分野的忧患意识——即一种“国家中心”的“爱国焦虑”。

实际上，正如下面讨论的，具有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越来越关注在当前族群关系紧张背后的中国持续复兴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在 10 年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对习近平领导下的所谓第五代领导人有极高的期望。随着薄熙来被清洗并惨淡离场，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习近平的管理能够重燃经济改革的火焰，甚至有可能放松政治控制。然而，目前仍然难以见到有可能开展族群政策改革的迹象。“自由主义者阵营”中虽然众说纷纭，但包含了对于目前族群政策的尖锐批评，但是至今为止对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最佳方案仍未得出共识。

但是，人们始终将当前的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独裁和保守的政治制度。对于族群议题的关切往往被当作是边缘的并且依赖于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更大主题的解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只有当“中国本部”转向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民主政治制度时，族群间的紧张关系才会终结或者逐步减低。

刘晓波在 3·14 事件之后写道（2012: 262-266），民主化是西藏问题任何解决出路的先决条件：“只要在中国本部的人被剥夺了真正的自治，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便仍然是白日梦。”

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担忧，在还未提高族群和文化凝聚力之前便加速民主化进程，有可能导致

国家分裂。追溯过去 10 年里自由主义思想的演进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观念转变，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已经转向支持马戎和胡鞍钢所提倡的改革，同时其他原本支持少数民族权利的人在近期的族群骚乱发生后也已经软化或者调整了自己的观点。

一个例子便是被冯崇义（2010）描述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完美典型”和“凝聚了过去十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和智力成果的成就”的“08 宪章运动”。这一大胆的关于改革的宣言，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由 303 位相关个人签署，其前身则是 1996 年 10 月 10 日宣言。在早期的宣言中，王希哲和刘晓波（1996）谈及了具有普世性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并且强调在江西苏维埃期间（1931-1934 年），“自决权”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解释为少数民族脱离中国并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

但是，08 宪章却并没有提及自决权。宪章的倒数第二目标声称：“我们应该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处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争论，试图去寻找一个可行的框架，使得所有族群和宗教群体都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得以兴旺发展。我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中国的民主联邦制度”（Link 2009）。在这里，既没有提出这一联邦制的具体形式也没有说明这一联邦制的实施范围（许多人将其解读为仅仅指的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对于西藏、新疆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未予说明（Guo 2009）。这反映出即使没有公开的分歧，宪章签署者在族群问题上依然缺乏共识。08 宪章是在拉萨骚乱之后、乌鲁木齐骚乱之前签署的，这些事件导致许多签署者要求政治改革必须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以著名的自由主义博主冉云飞为例，他是四川省的一名土家族成员，常年在四川西部高地的少数民族社区中从事研究工作。他因为自己的激进言论在 2011 年 3 月被拘禁了 6 个月，这更加巩固了他在微博和推特这些微博平台的名人身份（Johnson 2012b）。除了他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在 3·14 事件发生后再云飞所写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出对于少数民族的同情。冉云飞承认“呼吁族群、宗教以及人权等议题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同时谴责针对汉族公民的暴力事件（他将之和巴勒斯坦的自杀式恐怖袭击相比较）并且表示政府不能太仁慈。

除了在年末签署了 08 宪章外，在冉云飞的早期文章中除了提到“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在西藏实行高度的真正自治”外，并没有任何关于联邦制的设想。然后在 7·5 事件后，他的观点似乎更加强硬了。在 2009 年 7 月一篇博客中，冉云飞写到在中共的极权专制下，族群自治已不再可能。他严厉地批判了中共族群政策的僵化与保守本质。他指责这些政策导致了乌鲁木齐的“悲剧性的大规模屠杀”。冉云飞认为目前中国“分而治之”的方法只会“强化族群认同”，并且呼吁中国应该遵循美国的模式来取代当前政策，起码在理论上，所有人（忽略其族群身份）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Ran 2009）。

冉云飞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民主对国家统一的影响”的广泛关注。日前刚刚从《学习时报》的副主编位置被解雇的著名自由派人士邓聿文在 2012 年指出，任何草率的、不成熟的争取普选的运动将会导致国家沿着族群边界而分裂，这意味着族群关系的进一步修复将是任何政治改革的前提（Deng 2012）。“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居住在香港的知识分子王绍光（2002: 53）写到：“存在一种对于国家分裂的极度担忧。”

另一个 08 宪章的签署者刘军宁一直致力于追求联邦制。在 2002 年，他写道：“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中国在社会文化上包含了显著的多样性，因此应该自然地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Liu J. 2002）。但是，正如其他自由派一样，族群冲突导致他去反思自己的观点或澄清自己的位置。

刘军宁自称为“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位提倡个人权利普遍性的拥护者，因为自身关于政治的过激言论而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辞退（Liu J. 2000; 2011）。在乌鲁木齐骚乱的几天后，刘军宁（2009）论证到民族统一才是建立真正的政治自治的基础。刘强调，少数群体的肯定性行动（优惠政策）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但没有消解和缓和民族矛盾，反而加剧了族群分野，并且只会导致更多的族群冲突。刘军宁声称，中共现在实行的源自苏联的政策在族群之间创造出法律

上的差别，这一政策与中国传统以及国际准则背离，因此必须被抛弃。

他以一种勇敢的方式总结道：

因此，我们应该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消除“民族”这一概念，这样全中国的所有民族群体便可以共存、共融。为了消除不同族群身份之间的差别，我们应该从户籍、身份证以及各类文件中取消“民族”分类；废弃以各种方式去提及民族和少数民族；作为替代，通过给所有族群的个人以保留和护卫自己文化传统的权利，使得人人平等（Ibid）。

在一次和记者萧三匝（2012）的对话中，刘军宁断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种伪装的民族隔离制度”，应该废除这一制度，从而为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国的、基于领土而不是基于族群的联邦模式铺平道路。

还有同样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大同（2009b），他是《中国青年报》社下属有争议的《冰点》杂志的前主编，也呼吁中国应从共产党当前族群政策的“陷阱中解放自己”，在 BBC 的中文网页中，他声称“今天中国所有族群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并强化了族群差别。”

和刘军宁一样，李大同也因为批评政府的审查制度而在 2006 年被原单位撤职，并且最终签署了 08 宪章；但是他的这篇 2009 年文章中的观点明显受到马戎的影响（Hu 2009），认为中国共产党“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试图通过政治自治来解决在西藏、内蒙古的族群问题，这是一种完全与中国传统不符的文化策略。其结果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对 56 个“民族”的全新创造，这完全背离了民国时期曾经维系了和谐族群关系的“五族共和”。

“这一创造以及对于民族差异的强化”，李大同在《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上用英语写道，“意味着相比于自己的国民身份，少数民族的成员更加认同自己的族群身份。”像其他改革派一样，李大同（2009b）欣赏美国的“熔炉”模式，它帮助美国产生了第一位非裔总统——巴莱克·奥巴马。“中国实行民族自治制度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但是哪一个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或回族的个人能够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位置？”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清华大学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秦晖对族群问题持有最细致入微的观点。尽管他没有在 08 宪章上签字，但是他仍旧是联邦制和民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和刘军宁一样，他展望的是美国式的联邦而非前苏联的失败模式。在 2008 年和左派知识分子的对话中，秦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相信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Wang Y. 2008）。

在 2011 年 12 月，鉴于先前发生在新疆和西藏发生的暴力事件，秦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Cao 2012）。他承认“列宁主义体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且“当下的状况正在变得更糟”。他似乎在与民主化对中国族群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斗争，并且承认民族仇恨和潜在的“民族狂人”（ethnic maniacs）对中国这一庞大、异质性极强的国家的民主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然”，他在报道中声明：“我相信民族团结非常重要，但是，事实上我们目前处理民族团结的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 2012 年底，秦晖似乎找到了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在一篇反映前南斯拉夫和当今印度社会族群性地位的文章中，秦晖（2012）提出了他所谓的“左右多元化”的主张。如他所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国外殖民主义的产物并且接受了联邦国家体系。但是他们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国家分裂而后者经济发展而且政治充满生机。铁托的“强制性的族群多元主义”因为他的死亡而崩溃，同时印度多彩的民主制已经通过使意识形态而不是族别身份作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从而克服了族群和宗教差异。

在诸如印度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选举，秦晖争论说，起着诸如“伟大的族群融合洗礼”般的作用，不同的政治党派被迫跨越种族和宗教边界来拉拢选民。在秦晖看来，这样一种左-右派别的竞争防止了国家的分裂，因为：（1）不同于族群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立场是可以改变的个人选择；（2）不同于少数民族共同体，小的政治党派有可能演化成庞大的社会主流组织；（3）政治分歧是理性的并且可以通过讲道理来论证，而与此相对的便是族群身份的情感性。没有给中国提出任何特定的建议，秦晖总结到，“左右多元化”是多族群国家防止族群两极化和国家分裂的最佳防范措施。

居住在北京并很有影响力的王力雄和他的妻子次仁唯色（具有一半藏族血统）夫妇，对于中国的民族政策有着同样细致入微但彼此冲突的观点。二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族群政策的严厉批评者，呼吁对藏族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进行大力保护。

和他的妻子一样，王力雄（2008a; 2008b）指出“西藏的中国化”是当前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且认为中共试图通过财政资源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做法，未能争取到藏族的人心和思想。他提及一个“死板的、不灵活的和强硬的”官僚体制“正将中国推向分裂的深渊。”最好的以及最实用的解决方法，在王力雄看来是“渐进式民主。”这是一种植根于乡村选举的渐进式民主改革，这样也能够同时“保证中国的国家主权并使得西藏获得‘高度自治’。”与其自焚，藏人应该像他们在武汉、广东的公民同胞一样去追求乡村自治（Wang L. 2012）。

唯色对马戎的观点在自由派中不断增长的吸引力表示担忧，她担心民族区域自治的取消将会成为藏族文化和身份的丧钟（Carlson 2009）。

然而和其他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王力雄和唯色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在既渴望能够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又感到需要打破将藏族等少数民族与中国主流社会区隔开来的政策“深沟”。唯色认为中国在西藏的政治控制类似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或加沙地带的种族隔离（Woesser 2012）。根据唯色的说法，这个国家以“民族”为对象实行的优惠政策就如同另一种障碍，因此应该被废除。

中国的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

人们发现中国政治图谱中的左派对于当前的族群政策也存在相似的不满。和他们自由主义的同仁一样，对于这些所谓“新左派”的界定，更多是根据其政治倾向，而非根据任何单一的、思路连贯的或同质性的政治议程。植根于1989年之后对中国革命和本土传统的保卫，中国的左派在公共政策方面更倾向于一种新国家主义，这样一种政策兼收并包了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正义，偏好于采用本土式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难题。

更甚于他们自由主义同仁，左派将国家统一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并且警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分裂国家的力量。因为中国各族群已经混居生活了几个世纪并且分享共同的起源，左派以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拒绝联邦制。

重要的新左派经济学家温铁军提到，联邦制将是自杀性的，并将切断沿海省份获得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石油、淡水以及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Wang Y. 2008）。

大多数的左派承认市场化改革已经加剧了社会分化，导致“族群化”的阶层差异和区域差异，因此需要强大的国家管理以控制长期存在的族群紧张关系。许多左派公开表达了一种对于过去社会主义制度的怀旧感，他们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是一种共享的政治意识形态把不同族群团体得以统一在一起。

许多人认为汪晖是新左派的领袖，虽然他自己拒绝这样的标签。作为目前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汪晖主编了十余年的领军杂志《读书》，并且经常出现中国最具影响力知识分子的名单里。

和许多其他公众知识分子一样，汪晖在3·14事件之后就开始质疑当前的族群政策。在一篇

2011 年以英文出版的发散式的长文中（刚开始是在 2008 年一篇未经全面修订的访谈整理），汪晖重新开始（以一种萨义德的方式）对西方式东方主义的正面攻击。汪晖特别对西方误导下的西藏幻想表达了不满，指责一种“香格里拉效应”使得西方媒体扭曲了对拉萨骚乱报道，并且提到在西方国家存在一个更普遍的倾向，即忽略自 1949 年以来西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Wang Hui 2011: 137-154）。

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汪晖相信中国的族群关系会越来越紧张。他提到一种在西藏甚至是在全中国的“合法性危机”，并且警告国家的族群分类和限制身份转变将会导致族群差异的固化。他强调当前区域自治体系的危险是：“将会变得僵化和保守，并且把社会控制和管理转变为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命令”（Wang Hui 2011: 195）。

“经济的整合并未催生一种社会整合的情感，”汪晖写道，“反而引起了一种社会的分裂感”（Wang Hui 2011: 207-208）。汪晖认为马戎的文章是“最敏锐和最深刻的”，并且同意现在的族群政策需要调整，但是拒绝了对整个体系重新设计的呼声。他认为现在的政策不仅是“中国历史传统以及革命经验的顶峰”（Ibid.195），同时也是实现“真正平等”的最好办法，而不是仅仅是法律层面的平等。

然而，与马戎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晖将现有问题归咎于对于族群事务的“去政治化”。他认为，市场的发展逻辑并不能改善社会和族群矛盾。相反的，需要一种新的“承认的政治”和“尊重的政治”。国家必须通过重视社会多样性来积极地平衡统一和多元（即“多元中的统一”），承认群体具有差异性权利，并促进一种“基于普遍平等的新社会”（Ibid. 197）。

在政策调整的建议方面，汪晖遵循了王力雄以及其他一些自由派学者要求“更小范围”“草根式”自治的建议，但是在中国的背景下，需要为明确界定统一和多元之间的精确平衡而斗争。或许这种张力的最好例证，就是他关于语言与藏族身份认同（identity）的复杂讨论（Ibid. 215-7），为此他援引了改革派人士霍布斯鲍姆关于有些语言不可避免消失的论述。“因此，一方面你希望少数民族去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他告诉一位西方记者，“但是你同时也不希望这种差异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我们必须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但是也需要保证他们拥有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途径”（Wang Hui 2008: 12-13）。

在 3·14 事件之后，汪晖在清华大学的新左派同事崔之元（2009）认为，在 20 世纪初期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Otto Bauer 和 Karl Renner 提出的去领土化的“民族文化自治”，对于中国保护族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是一种更有效的办法。但是根据 Barry Sautman 的说法，这一途径会弱化群体权利并加强多数族群的统治（2010: 64）。

和中国的自由主义派一样，一些重要左派提出的意见呼吁对于族群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诸如“乌有之乡”（www.wyxs.com）和“草根”（www.caogen.com）这些流行的新左派网站包含了大量对现行做法的严厉批评。

以最近重新在“乌有之乡”发布的一篇文章为例，政策顾问梅新育（2012）指责那些民族系统的内部人员不加批判地抵制任何对于现行族群政策的反思：“我们不能将中国所有的族群问题都归咎于经济发展的不充足，而是应该看清事实，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他指出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和苏丹的经济发展并未能遏制族群暴力。但是和汪晖一样，梅新育并不主张全盘的改革。和汪晖不同的是，梅新育高度指责了针对“民族”身份的优惠政策，认为这些政策违背了平等的原则并且未能鼓励自我奋斗的精神。

在“草根”网站上，著名的《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2009）指出，日益紧张的族群关系会导致中国的“滑铁卢运动”并将国家引向分裂。《联合早报》的常驻评论员 Yu Shiyu（2009）将族群关系的日渐疏离归咎于“北京僵化和短视的族群政策”，并且呼吁加强国家认同和各族群之间的社会交流。最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批评者易富贤（2009）要求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易富贤认为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新的族群”，并且导致了那些在湖南西部被识

别为少数民族群的人口从 1949 年的 6.4% 增长至今天的近 40%。

司马平邦是另外一位重要和敢言的新左派博主。在 7·5 事件之后的几篇博文里，他攻击了基于族群的优惠政策。在他看来，这些不公正政策的本质被错误地理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外国人误读了乌鲁木齐的悲剧。政府的绥靖政策不但没有像许多外国人相信的那样压制了维吾尔族，反而使他们更加大胆，从而爆发了新疆的暴力事件。司马平邦认为，这些优惠政策削弱了国家团结并且侵犯了人权的核​​心原则——即人人生而平等。他乐观地总结道，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关于 56 个独立族群的观念将会消失——不同的群体将追随他们的祖先而彼此融合，共同组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在左派阵营的那些更激进的声音中，有些人被称为“极左派”，其中也有一些人同样对当前中国应对族群矛盾的方法进行批评。孔庆东和其他新毛派人士提出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毛泽东正确地辨识了族群矛盾，阻止其成为阶级矛盾，政府必须依靠广大民众（而非少数贵族阶层和僧侣）来解决西藏问题。在“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庆典之后，孔庆东在一次互联网访谈上谈到：“在西藏人民的心里，毛主席就是最受尊敬的活佛”（Kong Q. 2011a）。在提及新疆时，他声称：

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民族政策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探索，从昏睡中觉醒，加强团结。这是消灭恐怖组织的最好政策。如果你不能抓住大众的情感，处理不好干部和人民的关系，不能团结各民族，那么不管为解决问题投入多少财力和军队，你都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孔庆东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族群矛盾的“毒瘤”不能被拔出，牌局将迅速被掀翻，而中国将会突然发现四川和陕西成为新的边疆地区。

王小东（2007；2009），他是前沿的极端民族主义出版物《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同样批评了政府当前的做法。在一系列和“汉网”（www.hanminzu.org）亲汉活动分子的网络对话中，王小东表达了对于他们批评族群优惠政策的认同，并支持加强汉族认同（identity），但是同样呼吁团结，并呼吁在面对外国干涉西藏和新疆事务的状况下需要加强军国主义精神。

最后，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国际关系专家阎学通（2009）最近将民族团结（national cohesion）问题视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阎学通目前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以及核心期刊《国际政治科学》的主编。阎学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尽管他本质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曾在西方被称为“中国式的新保守主义者”并被另一些人称为现代的孔子。

阎学通在 2009 年对一位记者谈到，缺乏一个清晰的有关中华民族的结构和基础的“指导性原则”，这样西方在持续自己的整合主义策略例如坚持一种国家语言的同时，很容易批评中国毁掉了族群多样性。他详细地阐述到：“在我们政策当中有许多矛盾，这对于促进国家整合产生了严重阻碍。”他提到，例如多种货币的存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户籍制度“阻碍了人口的自由迁移并且减缓了不同族群混合居住的速度。”他进一步论证到，当前的国际环境支持国家解体并超越原有体制建立新国家，面对此种状况，中国的这些现行政策不仅强化了区域和族群的身份认同（identity），还削弱了共享的国家认同，构成了中国崛起的真正威胁。现在面临的新环境迫使中国：“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们的（族群）政策”（Yan 2009）。

更广泛的公众意见

对于族群政策改革的观点究竟是如何完全渗透进中国社会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公众意见是

难以查明的，尤其是对于族群政策、族群关系这类敏感问题。然而，在被小心翼翼加以控制的官方媒体之外，互联网为广大大众表达观点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拥有近五亿的用户，中文互联网世界为中国的“网民”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新工具。诸如博客、论坛、微博之类的互动平台展示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包括那些评论者），这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特点之一。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可以在公开的文章中发现各色关于族群问题的观点。

在中文网络中，汉族沙文主义的兴起很早就已被证实（Leibold 2010a; 2010b）。汉族的网民群体（集中于中国大陆但是也包括其他来自全球各地）已经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族群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已退休的中国政府官员、正在奋斗的企业家和学者和大学生们一同攻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削弱了汉族的权力和威望。很多汉族的种族优越论者公开支持一轮新的同化以恢复“自然的族群次序”。

然而，网络上关于当前中国族群政策的批评已经远非是汉族沙文主义了。同样可以观察到更为主流群体的崛起，这是被称为“愤青”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把族群区分视为国家衰弱的根源（Osno 2008）。在 3·14 事件之后，愤青不但批评西方的对西藏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报导和所持的观念，而且还批评他们自己政府的“少数民族的绥靖”政策。有一个海外的青年这样写道：“利用优惠政策优待少数民族去获得和谐，就如同给孩子糖吃让他们开心一样。有一天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会责备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的牙齿腐烂”（Berlind 2009）。

我们可以在一些主流平台上发现各类观点，包括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QQ 论坛（<http://bbs.qq.com>）甚至强国社区（<http://bbs1.people.com.cn>），一些人明确地批判现有族群政策而另一些则强烈支持。然而，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诸如新浪微博（www.weibo.com）、BBC 中文服务以及推特的中文网站的这类中文互联网世界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族群政策批评已经渐趋迈向了更加“自由”的领域。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一次与汉族村民的斗殴事件发生后，中国中部的一个地方当局声称要因为一些被损坏的切糕赔偿维吾尔商贩两万五千美元，这件事引发了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潮水般的讨论。推文包括：“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所有这类民族问题的根源（原文如此）”，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指责这是一种反向歧视（Alia 2012; Ford 2012）。BBC 的 Men Ke（2012）认为，在这种场景下，网络上的推问折射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争议，但是由于少数民族的网上声音相对缺乏，反映出来的更多是一边倒和汉族中心的观点。

网上投票提供了公众舆论的另一个窗口。但投票的样本量一般比较小，在 3214 位微博使用者中进行的投票中，超过 82% 的人赞成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消少数民族学生的加分政策，另外，仅有 9% 的人认为继续实行这一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是“很有道理的”。¹

然而，对中文互联网领域中批评观点的规模和影响力进行总结时，人们必须极其谨慎。大量的事例证明，有许多中国网民积极支持现有的族群政策，甚至拥护西方式的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崭露头角的网络测量领域正在提供另一个更具经验性的工具来追踪公众观点的发展趋势。例如，以百度指数（<http://index.baidu.com>）中获得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公众对于族群政策渐趋增长的兴趣。这可以通过对百度用户的搜索数据、媒体对于包含这些内容的报导数据进行衡量。²实际上，在“7·5 事件”之后，相关的搜索使用量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

人们发现自 2010 年中以来，对马戎³的搜索以及相关新闻也开始上升，在 2012 年春季由“第二代民族政策”引发的争论时达到了最顶峰。对相关词条包括“融合”、“自治区”这些通常（尽管并非独有）与“民族”（与民族融合）以及“民族自治区”一同使用的词条的搜索也呈上升趋势。同样的，关于“中华民族”以及“民族团结”的网页搜索也一直稳步（尽管没有规律）提升。

¹ 详见网站：<http://vote.weibo.com/vid=491693>

² 所有的搜索都在 2013 年 5 月 6 日进行，可在此处进行复制：<http://index.baidu.com>

³ 马戎在中国是一个少见的名字，在中国也没有其他类似的同名个人拥有如此显著的网络和公众形象。

对于这些搜索的分析展现了正在增长的公众关于族群议题的讨论和兴趣，但是并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观点或影响。公众关于族群议题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更深层的认知框架来形塑的？自 1949 年开始，政府便试图通过他们的教育和宣传系统来逐步培养文化多元性和多族群和谐共处的价值观，这些努力是不应当被低估的。尽管如此，Dikötter (1992)，Cheng Ying-hong (2011)，Callahan (2013) 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在深层次仍然是种族主义和排外的。

上千年以来中国的汉人已将“外人”（不管是长鼻子的外国人还是更熟悉的游牧民族）视为可疑和不可信任的。环境形势也许要求人们和平共存或者相互隔离，但是终极目标是自愿的转化：通过定居、通婚和接受汉族规范来消除外人和任何族群文化的差异。

Martin Jacques (2009: 266) 写到，“在实践中（尽管并非正式），绝大部分中国的汉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国族”。梁启超和孙中山使用“国族”这一新词来强调深度复杂和血缘性的自我认同。有趣的是，胡鞍钢和胡联合在他们呼吁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中，重新使用了这一概念。

5. 习近平领导下的族群政策

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是怎样看待族群政策改革的？简短的回答是：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领导人关于这一议题的态度。Barry Sautman (2010; 2012: 26) 近日写到，关于族群政策的争论已经触及中共高层，但是他的推测是，“目前迹象表明政府试图基本维持现有的政策。”然而，就在上一年出现一些有趣的发展——包括了 10 年一届的领导人换届推出了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

人们能够期待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族群政策会发生什么改变吗？能如许多中国内部和外部人士希望的一般，他的领导会给族群政策带来新的思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将会朝着什么方向？一些明显的迹象表明，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马戎、胡鞍钢以及其他政策改革者表达了公开的支持，尽管在这一阶段我们仅仅获得了一些零散的信息。

朱维群的“个人观点”

在 2012 年 2 月，前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监管族群政策的重要部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罕见地发表了呼吁反思当前族群政策某些方面的个人声明。在《学习时报》的头版文章中，朱维群 (2012) 承认了当前的做法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和很多其他的改革者一样，他在读者面前提到了对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血腥分裂幽灵的担心。他认为目前对于国家引导式发展的关注并不能解决族群问题，进而提出应该更多强调自愿、自发的民族交融与融合。朱维群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应允许行政体制阻碍人们自由流动或者使得族群差异进一步僵化。

作为国家沿着这条思路能够做什么的具体例证，朱维群个人建议取消身份证上的族群身份，停止设定任何新的族群自治单位，增加多族群混合学校以及加强普通话教育。自 2006 年以来，朱维群已经是中共关于族群和宗教事务的首席发言人，并且作为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核心对话者，他的这篇文章吸引了大量学者、媒体以及政策圈的广泛关注，并且在中文网络中被广泛地引用。

朱维群的观点很明显与马戎和胡鞍钢发表的观点有诸多共同点。在朱维群的文章中均没有提及二人的名字，但是很早以前马戎就已经被认为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长期顾问”。

在朱维群的文章发表之后，中国管理族群事务的另一个平行的行政单位——国家民委，在中国民族宗教网（www.mzb.com.cn）发布了一个特别的“探究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网页。在其首页上通过显眼的口号来吸引读者对于“观念之战”的注意力，而网站则收集了胡鞍钢提议发表后与之进行辩论的文章。¹

尽管这一网页收入了郝时远及其他反对改革议程者的二十余篇文章，但是支持者却寥寥无

¹ 网站首页旗帜在 2013 年春季被移除，但是特殊网页仍保持在：
<http://www.mzb.com.cn/html/Home/node/292573-1.htm>

几。在一个国家管控的网站上由公众来表达对国家政策的分歧意见，这是前所未有的，似乎反映出在中共高层存在类似的分歧。这很可能表示在国家民委系统和中共统战部系统之间在族群政策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和意见分歧。

在中国大陆之外，很多评论员已经广泛地将朱维群的文章解读为政策最终要改变的征兆。在美国的一名多维新闻的匿名博客断言：“这些观点（指呼吁改革）已经在中共最高层酝酿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共识，这一文章很有可能是中共‘引导公共观点’或者在更大环境中表态的习惯性做法，尽管关于族群政策改革的呼声已存在很长时间（Kong X. 2012）”。

在香港热门杂志《凤凰周刊》2012年3月的封面文章中，朱维群的文章被视为是族群理论的“突破”并且推测这反映了未来国家政策的方向（Phoenix Weekly 2012）。《凤凰卫视》网络核心政策评论员何亮亮（2012）告诉他的观众，改革议程将会超越朱维群的观点，并且将不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他认为，实际上朱维群的文章在中央党校官方杂志《学习时报》上发表，便已表示是“政府批准”，并且“通过提出这些观点，这预示着中国目前正在准备（政策调整）。”“我相信”，他补充说，“族群政策的改革正在酝酿中。”

虽然不同于何亮亮对改革议程的公开支持，美国的异见记者胡平（2012）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但是他强烈地批评马戎。鉴于朱维群长期以来在族群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胡平相信“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政策走向，值得仔细研究。”

在对这篇文章做出回应时，一些中共官员已在公开场合与朱维群的言论拉开了距离。前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否认朱维群的言论标志着政策改变的需要。向巴平措在被一位记者提问时声称：“我党的民族政策已经非常成功。”

但是，中国大陆记者目前对中共高层官员积极质询族群政策的发展方向这一简单事实，便反映这一争论在不断开放并受到高度重视。

胡锦涛的遗产和个人变化

尽管许多呼声要求改变族群政策，但是由于存在关键的制度及政策障碍，这使在可见的未来政策变化不具可能性。如同在中国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领域一样，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以及以官职为基础的现实利益使得任何有意义的政策改革极其困难。此种困难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的失败来证明，包括广泛不受好评的计划生育政策、劳教制度以及户籍政策。

此外，当前的族群政策与前总书记胡锦涛的遗产密切相关。作为1988-1992年期间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在担任最高领袖的10年期间在协调族群政策上扮演了直接的作用。胡锦涛个人将“正确处理族群议题”视为“评价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以及党组织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准”（Leading Group of the SEAC 2012）。政策上任何激进、突然的变化都将被视作是对胡锦涛遗产和其导师胡耀邦政策的否认。胡耀邦是后毛泽东时期族群政策的总设计师，并且也是习近平政治崛起的主要支持者。近期的行政职务任命也表明了胡锦涛的族群政策遗产很可能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将被小心地维护。

在他引人注目的失宠之后（因为他的儿子尴尬地死于一场法拉利车祸），胡锦涛最亲密的助手之一令计划在2012年8月份被任命为新一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曾经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也是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然而在最近的第18次党代会中，令计划甚至没有入选中央政治局（Johnson 2012a）。尽管令计划的政治影响已被明确地被削弱，但是在族群政策是延续还是改革方面，他仍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目前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继任者张裔炯，是胡锦涛的另一位盟友。不同于朱维群的“太子党”身份，张裔炯和胡锦涛的“团派”联系紧密。张裔炯官场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藏自治区任职，还在最近曾被提拔为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TIN 2012）。

有趣的是，66岁的朱维群虽然还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似乎已经被推出权力核心圈。

在第十八届党代会上他未能续任中央委员，并且在 2013 年 3 月离开中央统战部，被任命为更具仪式性的全国政协的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并没有实权的职位。

在十八届党代会之后，已经表明负责族群政策的核心机构可能转移至最近扩张至 7 人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Choi and Lau 2012; Wang Xin 2012)。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日常工作，在过去曾经承担过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角色。

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职业生涯的前二十年都在内蒙古）领导的新的书记处，现在有两位在族群政策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新人选：离任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和前国家民委主任杨晶（目前中国共产党内地位最高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三人通常都被认为是和“团派”联系在一起，并且因为胡锦涛才有了如此的高职，因此他们的任命似乎预示着在目前的政体下任何关于族群政策的变化都不太可能发生。

杨晶在 2013 年 3 月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这使得他接近了党和国家机构中决策制定的最高层。但是，无论杨晶还是他在国家民委的继任者王正伟，似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都不大可能会在族群政策的方向上施加决定性影响。

实际上，目前中国共产党在族群事务方面出现的新人物是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最近他被任命为中央西藏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Choi 2013)。在过去，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在这两个地区的族群政策方面扮演了协调和决策的关键角色，它们与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以及地方党委和安全机构密切合作，同时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在他这次升迁之前，“太子党”俞正声担任上海市党委书记多年，并且与前总书记江泽民关系亲近。

江泽民在党内持续的影响力有可能会支持一个长期的族群政策改革，特别是当他支持的习近平在强化其权威之后。87 岁的江泽民在组成当前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 个政治局常委中有 4 个人被认为是江泽民“上海帮”的成员。这些理由使得我们可以相信江泽民和习近平的“精英/太子党派系”比胡锦涛的“民粹派/团派系统”更倾向于族群政策的改革。

有报道称在“3·14 事件”和“7·5 事件”发生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族群政策方面发生了分歧。根据著名分析师 Willy Lam (2009) 的说法，江泽民试图说服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胡锦涛的族群政策在新疆和西藏是失败的，并且需要一个新思路。

在高层领导人中也有其他人同意这一观点，包括胡锦涛的盟友和新任副总理汪洋。在韶关以及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发生后，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公开支持对族群政策进行调整 (Ye 2009)。中央政治局成员、政策专家王沪宁过去曾经断言“民族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而且我们最终将看到：“族群区别的完全消失，民族的消亡，以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融合。”当他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共中央研究室主任时，王沪宁在对民族问题进行细致阐述时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同样有迹象表明许多身处安全机构中的人支持族群政策的新思路 (see Xu 2010)。沿着这个方向在族群政策方面的创新做法必然有助于增强国家整合。

“太子党将军”之一的刘亚洲以直言不讳出名，他和江泽民以及习近平都有亲密关系，长期以来支持在族群事务方面的新思路。刘亚洲最近被提升为上将，目前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以及中央委员成员。早在十几年前，刘亚洲 (2001) 便认为中国的未来，也就是它的“国运”取决于西部，尤其是新疆与中亚走廊（被刘称为“欧亚陆桥”）。刘亚洲认为这一区域是中国持续崛起所需自然资源所在地，也是美国遏制防线中最薄弱的地点。

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宗教和族群问题一直是刘亚洲所谓“西进”策略得以成功的关键点。族群和宗教分离主义威胁是这一计划的明显弱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亚洲提议将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割为更小的行政单位。他认为这样的措施将通过一种“检查-平衡制度”来削弱分裂势力的力量、改善族群矛盾并且促进更多的汉族移民进入这些地区。刘亚洲进一步说，如果中国希望能够避免像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的命运，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最近，刘亚洲国防大学的一位同事，少将徐焰 (2010) 提出一份更加详细的政策改革呼吁。

在《人民日报》的杂志上，他提到“弱化特定的族群身份是实现（民族）包容的最有效的途径。”并且和其他人一样，他将前苏联以及南斯拉夫的“族群联盟”的失败与印度和美国的熔炉模式的成功进行了对比。徐焰总结到，“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都证明了实现族群团结最好的道路就是在平等的条件下，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然融合。”

习近平的“中国梦”和族群政策

没有人真正知道习近平希望如何引导中国未来十年内的族群政策。他在拉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纪念日”的主题演讲中表明，习近平至今仍在小心翼翼地赞美党的路线（Xinhua 2011a）。他几乎没有直接的关于族群事务的经验，在向前推动任何政策调整时，他将不得不十分小心地驾驭现有利益的冲突。如前所述，习近平的家庭背景可能预示着在少数民族事务方面会有一个更加“柔和的路径”，或者至少是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如此。然而，早期的迹象似乎表明习近平将遵循他的前任们来强调民族和国家统一。

习近平上任以来便不断地提及“中国梦”。2012 年 11 月他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梦（Renmin Ribao 2013: 12）。2013 年 3 月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就职演讲上他又重返这一主题。在他相对简短的发言中，习近平提到了“走中国道路”，“培养中国精神”以及“巩固中国力量”的必要性，通过他在简短的发言中使用了 10 次“团结”，使得在他的理念中对集体精神的强调十分清晰。

《中国梦》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和国防大学研究员刘明福的具有争议的一本书的书名。在这本书中，作者呼吁中国公开地与美国竞争全球的影响力。尽管并非第一次使用这一标题，刘明福的书使用了和习近平的叙述相同的主题。此外，刘明福在他赞美中国人的同化力以及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国族”时还引用了孙中山。在 William Callahan（2013: 99）看来，这些都是充斥在刘明福的书中以及存在于许多其他中国人思想中的“黄种人至上主义”的例子。

在这一阶段，习近平的“中国梦”对于非汉的少数民族以及族群政策可能带来的更广泛影响仍是不清晰的。唯色（2013）已经声称，在这一汉族中心视野下的未来，没有藏族的空间。与此同时，新一届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回族）在他的讲话中提出：“要使得这一梦想成真，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民族工作上走得更远，并且更好地动员和凝聚 56 个民族群体，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培养强大的中国精神，并发挥中国力量的强大作用——这将是我们的如何追求、统一和实现中国梦的方法”（Xinhua 2013）。

在他担任国家民委主任后的第一次采访中，王正伟提及中国的族群工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重要转型”时期，但是没有提及任何详细的政策提案。他同样强调：“民族团结就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我们不知不觉从中受益，如果失去民族团结便将是一场灾难。”（Ibid.）

在国家民委每年批准的研究项目中包含一些要求政策创新的暗示。2013 年的选题更强调了第十八届党代会后的变化环境中的新思考。在这一份 6 页的文件中有 24 处提及了新名词，诸如“新要求、新政策和新策略”以应对“新形势和新问题”。这些论述包含了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内容、新途径”和“行政体制改革”这两类新的研究课题（SEAC 2012）。

习近平在对中国梦的解读中自带的民族主义色彩已越来越明显，并且表明他的政府将继续坚持政策改革与创新的本土模式。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以及他的支持者将新加坡及其“亚洲价值”视为一个处理中国族群关系的适当模式。据报道在 2012 年底，习近平亲自支持了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 10 部有关城市-国家治理模式的纪录片。这一系列纪录片有一集专门涉及族群政策的内容，暂时取名为“多元族群的融合”。

这个纪录片系列是刘亚洲将军的心血结晶。有些消息已经推测这一系列纪录片将成为新一届政府的“蓝图”（Huang 2012; Peh 2012）。《纽约时报》援引匿名人士的消息称，在 2010 年夏季在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习近平以及江泽民之间的一系列会议之后，习近平和江泽民同意“将尝

试在之后的道路上采用新加坡的模式（Wong and Ansfield 2012）。”

新加坡在族群政策方面能教给中国一些什么呢？根据颇有影响力的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的说法，可以提供相当多。郑永年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族群政策，并且与中国高层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保持良好接触。他同意马戎和胡鞍钢的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族群政策加剧了族群隔离、阻止了实现社会稳定和族群团结所需要的族群互动。在7·5事件之后，郑警告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直面这一政策危机，民族冲突将继续并且西方将抓住这一问题来“牵制”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Zheng 2009a; 2009b）。

郑永年同单伟（东亚研究所的同事）一起提出新加坡是民族政策改革的积极模式。不同中国当前的路径，新加坡强调国家利益和平等高于狭隘的群体利益和个人权利。这一国家密切地关注族群和宗教实践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整合性政策来促进共享一种的国家归属感。郑永年总结到，新加坡的经验提醒中国必须立刻加强其集体国家认同，逐步缩减然后消除民族区域自治，并且缩小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距。而这可以通过加强流动性、普通话教育以及不同族群间的合作以及其他创新性举措来实现（Zheng and Shan 2010）。

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明显地钦佩新加坡近来在其多元化人口中促进族群团结以及国家归属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党内有一些人相信，这一独特的与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不同的“东亚模式”，可能更适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在第十八届党代会召开前一周出版的《学习时报》上曾以头版文章的形式传达出这一信念。

6. 总结性思考

在中国不透明的政治制度下预测族群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中国预测”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至少十分明显是不成熟的。

如前所述，目前得到的信息表明在族群政策需要进行改革这一点上，正在逐步形成共识。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们和一些党政官员们公开地呼吁采用新方法加强族际团结以及国家整合，尽管对于什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仍有不同观点。有经验的族群政策观测员纳日碧力戈（Naran Bilik）近期承认，要求改变政策的呼声代表着目前的主要潮流。

但是，任何激进的政策变迁例如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或者结束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从近期到中期来看都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持有这种政治意愿，但是族群政策并不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并且中国政治系统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大胆积极的创新都难以确定。

此外，政权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永久性的核心关注也需要社会的稳定。这意味着加强在边疆地区的安全措施，例如扩大高科技监视和控制的“网格化管理”（HRW 2013），比起对当前族群政策和理论的任何重要的反思，这些努力更可能得以实施。

但是，随着领导层的变化，仍然可能出现一些细微但很重要的政策及言辞的调整，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加强社会凝聚力以及其在西部的汉族社区的合法性，以此作为政府“维稳”工作中的组成部分。这些调整可能包括从第三代身份证中取消“民族身份”，加强学习和使用中国官方普通话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户籍登记制度的改革中加强族群流动性。

简单来说，在当前政治系统依旧完好的情况下，得到强调的只是细微的调整，而不是对族群政策有任何重大变革的预期。改革者们（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普遍同意，如果中国希望能够避免更多的族群暴力甚至是分裂活动这些意外结果的话，改革需要一步一步地缓慢推进以达成共识。

除此之外，任何对于当前政策的重大改变将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重大修正，在许多少数民族以及国际社会中的眼中，这将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威望。但是，如果系统性的族群骚乱变得不断扩散，中国共产党可能被迫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如果在新疆和其他地区的汉族对于族群反向歧视政策的愤慨持续增加，这种改变就有可能发生。

由胡鞍钢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有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解体。俄罗斯联邦在前苏联教训的基础上为改革者诸如 Valery Tishkov（季什科夫，相当于俄罗斯的马戎）铺平了道路，从而得以重塑俄罗斯的族群政策，尽管过去实施的政策仍会继续发挥影响，使得俄罗斯的创新方案复杂化（Rutland 2010）。

如果如同马戎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中国族群政策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过程将是曲折和漫长的。但是，任何政策调整将必然会寻求使中国沿着更具凝聚力政体这一方向发展，而代价则是“民族”权力和自治的削弱。其结果是，在中国的族群关系得以真正改善（如果会有任何改善的话）之前，族群冲突和族群矛盾将会继续增长。

参考文献

- AFP. 2009. “China Denies Government Policy Reason for Urumqi Riots,” *AFP*, July 21.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afp_asiapacific/view/443778/1/.html.
- Ai Weiwei. 2008. “Xizang Shijian Zhengming Zhongguo Shaoshu Minzu Zhengce Shibai” [The Tibet Incident Proves That China’s Ethnic Minority Policies Have Failed]. *Deguo Zhi Sheng*, March 18.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8628>.
- Alia. 2012. “An Unbelievably Expensive Piece of Xinjiang Nut Cake and What It Tells About the Ethnic Policy in China.” *Offbeat China*, December 4.
<http://offbeatchina.com/an-unbelievably-expensive-piece-of-xinjiang-nut-cake-and-what-it-tells-about-the-ethnic-policy-in-china>.
- Barnett, Robert. 2009. “The Tibet Protests of Spring, 2008.” *China Perspectives* 3: 6–23.
- Barry, Brian. 2001. *Cultur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K: Polity.
- Bequelin, Nicholas. 2012. “Ethnic Unrest in China: The View from Beijing.” Public Lecture at The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September 12.
<https://itunes.apple.com/us/itunes-u/weatherhead-east-asian-institute/id534934901>.
- Berlinf. 2009. “Chinese Ethnic Policies and the Affirmative Action.” *Fool’s Mountain*, July 7.
<http://blog.foolsmountain.com/2009/07/07/chinese-ethnic-policies-and-the-affirmative-action-one-rationale-two-failures/>.
- Bhalla, A.S., and Dan Luo. 2013. *Poverty and Exclusion of Minorities in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ilik, Naran. Forthcoming. “How Do You Say ‘China’ in Mongolian?” In *Minority Educ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James Leibold and Chen Yangb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Bovington, Gardner. 2010. *The Uyghu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llahan, William. 2013. *China Drea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o Wuxing. 2012. “Qin Hui Zhengzhou ‘Zhongyuan Lundao’ Tan Minzu Guanxi” [Qin Hui Touches on Ethnic Relations When Discussing the ‘China Model’ in Zhengzhou].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 January 6. <http://www.chinese.rfi.fr/中国/20120106-秦晖郑州“中原论道”谈民族关系>).
- Carlson, Aubrey. 2009. “Minority Policy: Xinjiang Riots Spark Debate Over Reforming the System.” *Wikileaks: 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s*, December 11. <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9BEIJING3314>.
- Castells, Manuel. 2010. *The Power of Identity*. 2nd ed. West Sussex, UK: Wiley- Blackwell.
- CECC. 2010a. “Central Leaders hold Forum on Xinjiang, Stress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s Dual Goals.”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July 8.

-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el=141407>
- CECC. 2010b.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Outlines 2010–2020 'Tibet Work' Priorities at 'Fifth Forum'."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March 9.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el=135152>
- Chan, Minnie. 2013. "China's New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er 'Has Little Pow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0.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194988/chinas-new-ethnic-affairs-commissioner-has-little-power>.
- Chen Fang. 2012. "Xiangba Pingcuo" (Qiangba Puncog). *Huangfeng Wang*, March 28.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3/28/13497187_2.shtml.
- Cheng Li. 2008. "Ethnic Minority Elites in China's Party-State Leadership."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5: 1–13.
- Cheng Li. 2011. "Introduction." *In 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xv–xl.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heng Yinghong. 2011. "From Campus Racism to Cyber Ra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207: 561–79.
- Choi Chi-yuk and Mimi Lau. 2012. "Expansion of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iat May Reflect Ethnic Unre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9.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083426/expansion-central-committee-secretariat-may-reflect-ethnic-unrest>.
- Choi Chi-yuk. 2013. "CPPCC Chair Heads Xinjiang, Tibet Affairs Group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4.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52832/cppcc-chair-heads-xinjiang-tibet-affairs-groups>
- Cliff, Thomas. 2012. "The Partnership of Stability in Xinjiang." *The China Journal* 68: 79–105.
- Connor, Walker.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i Zhiyuan. 2009. "Cong Aodili Makesi Zhuyi Xuepai De Feiditu Minzu Faren Lilun Kan Zhongguo Minzu Zhengce" [China's Ethnic Policies in Light of the Austrian Marxists' Non-Territorial Ethnic-Legal Theory]. Powerpoint slides from public lecture, New York University.
<http://www.strongwindpress.com/ppt/tuijian/CuiNYU.ppt>.
- Davies, Gloria. 2007. *Worrying Abou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ng Yuwen. 2012. "What Kind of Democracy Do We Need?" *China Elections and Governance*, September 9. <http://chinaelectionsblog.net/?p=20736>.
- Dikötter, Frank.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 Co.
- Dreyer, June Teufel. 1999. "China, the Monocultural Paradigm." *Orbis* (Fall): 581–97.
-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i Xiaotong. 1988. "Plurality and Unity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tannerlectures.utah.edu/lectures/documents/fei90.pdf>.
- Feng Chongyi. 2010. "Charter 08, the Troubled History and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2.1. <http://www.japanfocus.org/-feng-chongyi/3285>.
- Ford, Peter. 2012. "Fight Over Snack in China Lights Up Blogospher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4.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2/1204/Fight-over-snack-in-China-lights-up-blogosphere>.

- Freeman, Carla. 2013. "From 'Blood Transfusion' to 'Harmoniou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1.4: 11–44.
- Gladney, Dru. 2004. *Dislocating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oldman, Merle, and Timothy Cheek. 1987. "Introduction." In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Merle Goldman,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rmin, 1–22. Cambridge, MA: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 Gongmen Law Research Center. 2009.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In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auses of the 3/14 Incident in Tibetan Area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June 1. <http://www.savetibet.org/media-center/ictnews-reports/bold-report-beijing-scholars-reveals-breakdown-china's-tibet-policy>.
- Guan Yin. 2007. *Zuqun Zhengzhi [Ethnic Politics]*.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Guo Qinghai. 2009. "'Lingba Xianzhang' Yu Lianbang Gonghe" ['Charter 08' and Federalism]. *Beijing Zhi Chun*, February 27.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120/2009227105335.htm>.
- Hao Shiyuan. 2005. "Gou Jian Shehui Zhuyi Hexie Shehui Yu Minzu Guanxi" [Relations Among Nationalities and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Socialism]. *Minzu Yanjiu* 3: 1–14.
- Hao Shiyuan.. 2012. "Sulian Shibao, Meiguo Ye Wei Chenggong" [The USSR Failed, But America Has Also Yet to Succeed]. *21ccom.net*, May 30.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qgc/article_2012053060752.html.
- Harrell, Stevan. 1995.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the Reaction to Them."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ited by Melissa Brown, 3–36.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He Liangliang. 2012. "Zhongguo Shaoshu Minzu Ronghe Bu Tong Yu Hanhua" [The Fusion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is Not the Same as Assimilation]. *Fenghuang Weishi*, February 17.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sh/detail_2012_02/18/12603835_0.shtml.
- Hong Sha. 2012. "Jiazuo Fojiao Yuanyuan Shen" [Buddhism Runs Deep Within the Clan]. *Duowei Xinwen*, November 15. <http://china.dwnnews.com/news/2012-11-15/58962449.html>.
- HRW. 2013. "China: Alarming New Surveillance, Security in Tibet." *Human Rights Watch*, March 20. <http://www.hrw.org/news/2013/03/20/china-alarming-new-surveillance-security-tibet>
- Hu Angang and Hu Lianhe. 2011. "Dierdai Minzu Zhengce" [Second Generation of Ethnic Policies]. *Xinjia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o)* 32.5: 1–13.
- Hu Ping. 2009. "Tantan Minzu Zizhi Wenti" [Talk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Ethnic Autonomy]. *Beijing Zhi Chun*, May. 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7/xianzhang/6_1.shtml.
- Hu Ping. 2012. "Zhonggong Yao Tiaozheng Minzu Zhengce Ma?" [Does China Need to Readjust its Ethnic Policy?]. *Radio Free Asia*, February 20.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p-02202012131802.html>.
- Huang Yuanshan and Zhang Wenshan. 2007. "Minzu Quyu Zizhiquan De Xianzheng Jieshi" [Explaining the Right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in the Constitution]. *Guangxi Minzu Yanjiu* 1: 12–18.
- Huang, Cary. 2012.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Suggests it Could Learn from Singapore's PA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067561/communist-party-journal-suggests-it-could-learn-singapores-pap>.
- ICT. 2013. "New Challenges to Tibet Policy from inside China."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June 27. <http://www.savetibet.org/new-challenges-to-tibet-policy-from-inside-china/>

- Jacques, Martin. 2009.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 Jia Wenshan, Y.T. Lee, and Zhang Haiyang. 2012.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in China." In *Handbook of Ethnic Conflict*, edited by Dan Landis and Rosita Albert, 177–96. New York: Springer.
- Johnson, Ian. 2012a. "China Faces New Scandal Over Crash of a Ferrari."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http://www.nytimes.com/2012/09/04/world/asia/after-ling-jihuas-demotion-news-of-sons-crash-in-ferrari.html>.
- Johnson, Ian. 2012b. "Learning How to Argue." *NYR Blog*, March 1. <http://www.nybooks.com/blogs/nyrblog/2012/mar/02/learning-how-argue-interview-ran-yunfei/>.
- Kong Qingdong. 2011a. "Mao Zhuxi Jiu Shi Zui Da De Huofu" [Chairman Mao is the Biggest Living Buddha]. *Hongge Hui Wang*, July 19. <http://www.szhgh.com/html/48/n-3148.html>.
- Kong Qingdong. 2011b. "Zhongguo Jueqi Bixu Xuyao Jiejue De Wu Ge Wenti" [Five Problems That Must be Solved for China's Rise]. Preface to Xu Liang, *Diguo Xingshuai Yu Diguo Bianjiang De Bengta* [Rise and Fall of Empires and the Collapse of Empires' Border Regions]. Beijing: Falu Chubanshe. http://www.qstheory.cn/jj/jjgyfz/201109/t20110907_108581.htm.
- Kong Xie. 2012. "Zhongguo Minzu Zhengce Mianlin Gaibian Yu Tiaozhan" [China's Ethnic Policies are Facing Change and Challenges]. *Duowei Boke*, February 19.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2-19/58604752.html>.
- Lam, Willy. 2009. "Jiang Zemin Casts Long Shadow Over National Day Parade." *China Brief*, October 7.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tx_ttnews\[tt_news\]=35587](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tx_ttnews[tt_news]=35587).
- Leading Group of the SEAC. 2012. "Ethnic Initiative Since the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Quishi* 4.3. http://english.qstheory.cn/politics/201210/t20121009_185283.htm.
- Leibold, James. 2007.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eibold, James. 2010a. "More than a Category." *The China Quarterly* 203 (September): 539–59.
- Leibold, James. 2012. "When Will China Have its First Minority President?" *The Atlantic*, November 8.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11/when-will-china-have-its-first-minority-president/264961/>.
- Leibold, James. 2010b. "Sheep in Wolves' Clothing? The Book the Han Nationalists Love to Loath." *The China Beat*, January 7. <http://www.thechinabeat.org/?p=1301>
- Li Datong. 2009a. "China's Tibet: Question with No Answer." *Open Democracy*, April 23.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chinas-tibet-question-with-no-answer>.
- Li Datong. 2009b. "Xizang Wentu Yu Jiema?" [Is There a Solution to the Tibet Problem?]. *BBC Chinese Service*, April 7.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80000/newsid_7985400/7985440.stm.
- Li Datong. 2011. "Yingmei: Neimeng Kangyi Shi Minjian Duonian Yiyuan Suozhi [English Media: Inner Mongolian Protests are Caused by Years of Accumulated Rancor Among the People]. *Duowei Xinwen*, May 31.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1-05-31/57764336.html>.
- Li Hong. 2009. "Urumqi Killing is Barbaric."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10.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2/96743/6697878.html>.
- Li Xiaoxia. 2004. "Zhongguo Ge Minzu Jian Zuji Hunyin De Xianzhuang Fenxi"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Different Chinese Ethnic Groups]. *Renkou Yanjiu* 3. http://www.xjass.com/shx/content/2008-07/30/content_25784.htm.
- Li Yin and Wang Tian. 2012. "Shibada Wei Minzu Gongzuo Zhiming Le Fangxiang" [The Eighteenth

- Party Congress' Orientation on Ethnic Work]. *Zhongguo Minzu Bao*, November 13.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44211-1.htm>.
- Lim, Benjamin, and Frank Daniel. 2012. "Does China's Next Leader Have a Soft Spot for Tibet?" *Reuters*, August 3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8/30/us-china-tibet-xi-idUSBRE87T1G320120830>.
- Link, Perry, trans. 2009. "China's Charter 08."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5.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9/jan/15/chinas-charter-08/>.
- Liu Junning 2002. "Liansheng Zizhi" [Provincial Self-Rule]. *Zhanlie Yu Guanli* 54. http://blog.boxun.com/hero/liujn/31_5.shtml.
- Liu Junning. 2000. "Classical Liberalism Catches 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11.3: 48–57.
- Liu Junning. 2009. "Quxiao Minzu Duoyuan Gongzhi" [Abolishing Minzu: Multivariate Collective Rule]. *BBC Chinese Service*, July 20.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50000/newsid_8158800/8158867.stm.
- Liu Junning. 2011. "The Ancient Roots of Chinese Liberalis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6.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760604576427931129537282.html>.
- Liu Ling. 2012. "Jianchi Jiben Zhengzhi Zhidu Zai Fazhan Jiejue Minzu Wenti" [Persist in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Resolve Ethnic Issues Through Development].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ASS, February 23. <http://iea.cass.cn/content-BA0810-2012031609383390681.htm>.
- Liu Mingfu. 2010. *Zhongguo Meng [China Dream]*. Beijing: Zhongguo Youyi Chuban Gongsi.
- Liu Xiaobo. 2012. *No Enemies, No Hatred*.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Yazhou. 2001 [2007]. "The Grand 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0.2: 13–36.
- Liu, Melinda. 2012. "Will Beijing's New Leaders Solve the Tibet Crisis?" *Newsweek*, August 15.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12/10/14/will-beijing-s-new-leaders-solve-the-tibet-crisis.html>.
- Ma Rong 2009b. "Meiguo Ruhe Chulu 'Minzu Wenti'?" [How Does America Handle the 'Ethnic Question'?). *Nanfang Zhouwei*, July 16. <http://www.infzm.com/content/31554>.
- Ma Rong. 1999. "Zhongguo Ge Minzu Zhijian De Zuji Tonghun" [Interethnic Marriages Among Each of China's Ethnicities]. *Minzu Shehuixue Tongxun*, 16: np.
- Ma Rong. 2007. "A New Perspective in Guiding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n Ethnicity* 8.3: 199–217.
- Ma Rong. 2009a.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Ethnic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SS)*, November 13.
- Ma Rong. 2010. "Policie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 Ma Rong. 2011. "Income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Occupational Groups and Ethnic Groups." *ProtoSociology* 28: 101–29.
- Ma Rong. 2012. *Zuqun, Minzu Yu Guojia Goujian [Ethnicity, Nationality and Nation-Building]*.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Ma Rong. 2013. "Guanyu Dangqian Woguo Minzu Wenti de Jinyibu Taolun: Yetan 'Dierdai Minzu Zhengce'." (Further Discussion of our Country's Ethnic Issues: Talk of a 'Second Generation of Ethnic Policies'). *Minzu Shehuixue Yanjiu Tongxun* 127 (January 15): 1-17.
- Mackerras, Colin. 2012. "Causes and Ramifications of the Xinjiang July 2009

- Disturbances.” *Sociology Study* 2.7: 496-510.
- Mackerras, Colin. 2003.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Mackerras, Colin. 2006. “Ethnic Minorities.” In *Critica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Czeslaw Tubilewicz, 167–91. London: Routledge.
-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ei Xinyu. 2012. “Weihe Minzu Guangxi Chuxian Bu Hexie? [Why Do Ethnic Relations Appear Un-Harmonious?]. *Wuyou Zhi Xiang*, May 24. <http://www.wyzxsd.com/article.php?id=534>.
- Meng Ke. 2012. “Zangren Zifen, Qiegao Shijian Yu Minzu Zhengce Jiantao” [Tibetan Self-Immolation, the Nut-Cake Incident and Ethnic Policy Thoroughly Discussed], *BBC Chinese Service*, December 21.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2/121221_new_nationality_policy.shtml.
- Millward, James. 2009. “Does the 2009 Urumchi Violence Mark a Turning Point?” *Central Asian Survey* 28.4: 347–60.
- Mullaney, Thomas. 2011.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aughton, Barry, and Dali Yang. 2004. *Holding China Togeth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al Daily. 2009. “Shaoguan Wei-Han Da Chongtu” [The Shaoguan Han-Uyghur Riot]. *Dongfang Ribao*, June 29.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090629/00182_001.html.
- Osnos, Evan. 2008. “Angry Youth.” *The New Yorker*, July 28.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8/07/28/080728fa_fact_osnos.
- Peh Shing Huei. 2012. “CCTV Goes Big on S’pore with 10-Parter.”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6. <http://www.straitstimes.com/the-big-story/asia-report/china/story/cctv-goes-big-spore-10-parter-20121026>.
- Phoenix Weekly. 2012. “Dalu Minzi Shibie Wenti Jiantao” [The Mainland’s Ethnic Classification Question Thoroughly Discussed]. *Fenghuang Zhoukan* 9. <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5237>.
- Qin Hui. 2012. “‘Zuoyou Duoyuanhua’ Zui Neng Danhua Minzu Rentong Duoyuanhua” [‘Left-Right Pluralism’ Can Best Weaken the Plurality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s]. *Nanfang Dushi Bao*, March 4.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78908-2.htm>.
- Qiu Zhenghai. 2009. “Xinjiang Saoluan Jiqi Chuli De Jidian Guancha” [Several Observations About the Xinjiang Riots and Their Handling]. *Caogen*, July 14.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90&articleId=15569.
- Ran Yunfei. 2008. “Wo Dui Xizang Wenti De Taidu” [My Views on the Tibet Problem]. *BBS.51*, March 20. <http://bbs.51.ca/thread-160559-1-1.html>.
- Ran Yunfei. 2009. “Wo Dui Xinjiang Wenti De Kanfa” [My Views on the Xinjiang Problem]. *Xin Shijie Xinwen Wang*, July 9.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907/20090709233919.html>.
- Renmin Ribao. 2013. *Zhongguo Meng [The Chinese Dream]*.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RFA. 2013. “Tibetans Allowed to Openly Revere the Dalai Lama in Two Chinese Provinces.” *Radio Free Asia*, June 26.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allowed-06262013180033.html>
- RFI. 2009. “Zhongguo Zhengfu Jiancheng Minzu Zhengce Zhengque Xuezheng Paichi Wei Tuonian Zhengce” [Chinese Government Insists that the Ethnic Policies that Academics Denounce as an

- Ostrich Policy are Correct].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 July 21.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5/article_14974.asp.
- Rutland, Peter. 2010. "Ethnicity Policy in Russia." In *Institutions, Ideas and Leadership in Post-Soviet Russia*, edited by Julia Newton and William Tompson, 116–3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autman, Barry. 2010. "Scaling Back Minority Rights?"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1: 51–120.
- Sautman, Barry. 2012.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Modern China* 38.1: 10–39.
- Schiavenza, Matt. 2013. "China to Tibetans: Stay Put." *The Atlantic*, January 31.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3/01/china-to-tibetans-stay-put/272709/>.
- SCMP. 2013. "Mongol Ally of Incoming Premier to Become Chief of State Council."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8.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185815/mongol-ally-incoming-premier-become-chief-state-council>.
- SEAC. 2012. "Guojia Minwei Bangongting Guanyu Shenbao Guojia Minwei Minzu Wenti Yanjiu Xiangmu 2013 Niandu Ketu de Tongzhi" [SEAC General Office Announces Annual 2013 Research Project Topics on Ethnic Issues]. *SEAC Website*, December 21.
http://www.seac.gov.cn/art/2012/12/21/art_144_174225.html.
- Shambaugh, David.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rk, Susan, ed. 2011.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a Pingbang. 2009a. "Bai Nian Nei Wancheng 'Zhonghua Minzu' Qudai 56 Zu De Yitong" [Replacing the Unity of 56 Ethnic Groups with a Single 'Chinese Nation' Within 100 Years]. *Fenghuang Blog*, July 9.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911763.html>.
- Sima Pingbang. 2009b. "Gaokao Zhuangyuan Zaojia De Zui Yuan Shi Minzu Youhui Zhengce" [Preferential Minority Policies are the Original Sin Behind the Gaokao Top-Scorer's Fabrication]. *Sina Blogspot*, July 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fd7410100e19e.html?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 Song Xiongwei. 2012. "Xinjiapo Jianshe Fuwu Xing Zhengfu De Jingyan" [Singapore's Experience Building a Service-Style Government]. *Xuexi Shibo*, October 22.
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qgc/article_2012102269467.html.
- State Council. 2009. *White Paper: Ethnic Polic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September 27. http://www.china.org.cn/government/whitepaper/node_7078073.htm.
- Tang Wenfang. 2005.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N. 2012. "Business as Usual."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188.
<http://www.tibetinfonet.net/content/update/188>.
- Wang Hui. 2008. "Modern China Emerged Before its Encounter with the West."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5.4: 10–15.
- Wang Hui. 2011. "The 'Tibetan Question' East and West." In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136–2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uning. 2004. *Zhengzhi De Luoji [Logic of Politic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Wang Lixiong. 2008a. "March Incident in Tibet is the Watershed: Roadmap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Chapter One)." *Wang Lixiong Wenku*. <http://wlx.sowiki.net/?action=index&cid=2>.
- Wang Lixiong. 2008b. "A True 'Middle-Way' Solution to Tibetan Unrest." *WSI China Security* 4.2:

27–37.

- Wang Lixiong. 2012. “Chule Zifen, Hai Neng Zuo Shenme?” [Besides Self-Immolation, What Can Be Done?]. *Invisible Tibet*, January 14.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blog-post_14.html.
- Wang Shaoguang. 2002. “Zhongguo Caizheng Zhuanyi Zhifu De Zhengzhi Luoji” [The Political Logic of Fiscal Transfers in China]. *Zhanlüe Yu Guanli* 3: 47–54.
- Wang Xiaodong. 2007. “Wang Xiaodong Diyici Zuke Hanwang Yu Wangyou Duihua” [Wang Xiaodong’s First Dialogue with Netizens and Guest Appearance on Hanwang]. *Hanwang*, August 11. [no longer available]
- Wang Xiaodong. 2009. “Wang Xiaodong Dierci Zuke Hanwang Yu Wangyou Duihua” [Wang Xiaodong’s Second Dialogue with Netizens and Guest Appearance on Hanwang]. *Hanwang*, April 11. [no longer available]
- Wang Xin. 2012. “Dangnei ‘Neige’ Da Bianlian” [Big Changes to the Party’s Inner Cabinet]. *Duwei Xinwen*, November 17. <http://18.dwnews.com/news/2012-11-17/58965829.html>.
- Wang Xizhe and Liu Xiaobo. 1996. “Zhi Guogong Liangdang De Shuangshi Xuanyan” [20 Point Manifesto for the CPC and KMT]. *Beijing Zhi Chun* 11.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6/170/2003127175607.htm>.
- Wang Yiyou. 2008. “Qin Hui, Wen Tiejun, Wang Hui Sanren Duihua [A Dialogue Between Qin Hui, Wen Tiejun and Wang Hui].” *Douban*, January 26.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548767/>.
- Wenrui Tiankong. 2008. “Woguo Minzu Zhengce Zhidu Gai Yijing Keburonghuan” [The Reform of Our Country’s Ethnic Policies Cannot Be Delayed a Second Further]. *Sina Blogs*, August 2. <http://blog.sina.com.cn/lj0621>.
- Woeser, Tsering. 2012. “‘Huchenghe’ Yu ‘Zhongzu Geli’” [‘Moats’ and ‘Apartheid’]. *Woeser Middle Way*, July 25.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7/blog-post_25.html.
- Woeser, Tsering. 2013. “No Room for Tibetans in the Chinese Dream.” *Radio Free Asia*, March 5. <http://www.rfa.org/english/commentaries/room-03052013153949.html>.
- Wong, Edward, and Jonathan Ansfield. 2012. “Many Urge Next Leader of China to Liberaliz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http://www.nytimes.com/2012/10/22/world/asia/many-urge-chinas-next-leader-to-enact-reform.html>.
- Wu Yan. 2012. “Minzu Lilun Yanjiu Redian Wenti Xueshu Yantaohui Zaijing Juxing” [Academic Symposium on the Hot Topic of Minzu Theory Opens in Beijing]. *Zhongguo Minzu Bao*, April 13. <http://www.mzb.com.cn/html/node/294149-1.htm>.
- Xiao Sanza. 2012. *Zuoyouweinan [Predicament]*. Fujian: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Extracted at <http://news.boxun.com/forum/201301/lilun/3081.shtml>.
- Xinhua. 2010. “Zhengfu Gongzuo Baogao” [Government Work Report], March 1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5/content_13174348.htm
- Xinhua. 2011a. “Full Text of Speech by Xi Jinping at Tibet’s Peaceful Liberation Anniversary Conference,” China.org, July 19.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1-07/19/content_23023375.htm.
- Xinhua. 2011b. “Life Expectancy in Tibet Nearly Doubled Over Last Six Decades.”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12.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785/7436448.html>.
- Xinhua. 2013. Wang Zhengwei Minzu Gongzuo Redian Nandian Shou Xinhuashe Zhuanfang [Special Interview with Wang Zhengwei on the Hotspots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Ethnic Work]. SEAC, April 19. http://www.seac.gov.cn/art/2013/4/19/art_31_182155.html.

- Xu Yan. 2010. “Women Dou Shuyu ‘Zhonghua Minzu’” [We All Belong to the ‘Chinese Nation’]. *Huanqiu Renwu*, December 15.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51863/13488774.html>.
- Yan Xuetong. 2009. “Jiaqiang Minzu Guojia Jiangou Shi Zhongguo Weilai De Zhongda Shiming” [Strengthening the Fabric of the Nation-State is a Weighty Mission for China’s Future]. *Zhongguo Shehui Kexue Bao*, July 3.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9591710.html>.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63&articleId=16139.
- Ye Bing. 2009. “Wang Yang Tan Zhongguo Minzu Zhengce Wenti” [Wang Yang Talks About the Problem of China’s Ethnic Policies]. *VOA Chinese*, July 31.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a-21-2009-07-31-voa41-60881482.html>.
- Yi Fuxian. 2009. “Cong Xiangxi Minzu Renkou Goucheng Kan Zhongguo Minzu Zhengce De Zouxiang” [Looking at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thnic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thnic Population of Western Hunan]. *Caogen*, August 17.
- Yu Shiyu. 2009. “Xinjiang Dongluan He Yilang Dongluan De Duibi [Comparing the Xinjiang Turmoil with the Iran Turmoil]. *Caogen*, July 13.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93&articleId=15548.
- Zhao Tingyang. 2005. *Tianxia Tixi [The Tianxia System]*.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Zheng Yongnian and Shan Wei. 2010. “Jiang-Zang Saoluan Yuanyin Pouxu Ji Xinjiapo Jingyan De Qishi” [An Analysis of the Tibet and Xinjiang Riots in Light of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Dongya Lunwen* 77. www.eai.nus.edu.sg/CWP77.pdf.
- Zheng Yongnian. 2009a. “Xinjiang, Xizang Wenti Yu Zhongguo De Guoji Guanxi” [The Xinjiang and Tibet Problem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fang Ribao*, July 28.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09-07/28/content_5433512.htm.
- Zheng Yongnian. 2009b. “Zhongguo Shaoshu Minzu Zhengce De Wenti Daodi Zai Nail?” [Where is the Problem with China’s Ethnic Minority Policy?]. *Lianhe Zaobao*, July 21.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0721c.shtml>.
- Zhu Weiqun. 2012. “Dui Dangqian Minzu Lingyu Wenti De Jidian Sikao” [Some Thoughts on Issues Related to Current Ethnic Problems]. *Xuexi Shibao*, February 13.
http://www.studytimes.com.cn/2012/02/13/01/01_51.htm.
- Zhu Yuchao and Dongyan Blachford. 2012. “Economic Expansion, Marketization, and Their Social Impact o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and Tibet.” *Asia Survey* 52.4: 714–33.

【论 文】

如何认识藏族及其文化*

石 硕

* 本文是根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石硕教授于2014年10月25日在西藏大学为第三批援藏干部所作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讲座由西藏自治区组织部、西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办。录音整理人：央宗、李志英。

[摘要]本文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点谈如何看待异文化；二、从高原地理环境认识藏族的生活方式；三、从高原环境认识藏族的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四、藏族的文化性格。文中许多认识源于作者多年从事藏学研究的积淀和在藏区进行田野调查的体验、观察与思考。文章对异文化背景的人如何认识和理解藏族及其文化提供了一个认识框架与思考角度,不乏参考意义。

[关键词] 藏族 藏族文化 青藏高原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藏族及其文化的话题。今天在座的除了藏大的老师和研究生同学,主要是援藏干部,所以我选择了这个题目。首先我向援藏干部表示敬意,大家从内地来到边疆,离开自己的小家,千里迢迢来做援藏工作,是一件很有时代意义的事情,我相信这对大家来说将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我和大家一样,也和西藏有缘,我第一次进藏是1991年,来了之后就被这片神奇的土地和厚重的文化深深吸引。因为做藏学研究,西藏的七个地市我都跑过,我带的博士生中,跟我念博士的也有援藏干部,所以我对援藏干部的经历并不陌生。据我了解,对于我们从内地来到西藏的人来说,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藏族及其文化?我们从进藏开始到离开西藏,乃至回到内地,这个问题可能始终萦绕在我们脑子里。我们在内地生活,基本上不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说一样的语言,有一样的生活模式和习俗,一样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的交流没有文化的障碍。但是当我们来到一个异文化的区域和环境,会发现周围人说的语言、穿着的服饰、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价值观念和我们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和他们的交流存在着障碍。原因是我们跨了文化,我们从一种文化跨入到另一种文化里面来了。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来看待藏族及其文化就成为我们进藏以后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在西藏生活和工作质量,也和我们的援藏工作的成效密切相关。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话题,因为知识性的话题我们在书本上都能找到。我主要是想结合我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对于我们从内地来到西藏的人,应当如何来认识和理解藏族及其文化。我希望这个话题能对大家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

我讲四个问题：一、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点谈谈如何看待异文化；二、从高原地理环境认识藏族的生活方式；三、从高原环境认识藏族的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四、谈一下藏族的文化性格。

第一个问题,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点谈谈如何看待异文化。

在人文学科领域,有一个专门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我先介绍一下文化人类学对待异文化,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很有意思,在17、18世纪,西方在殖民扩张中,征服了大量的殖民地。但他们很快发现,要对殖民地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统治,按照西方文明文化中心观念去制定政策、实施管理遇到很大困难,于是开始研究殖民地的文化。最

初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殖民者提供决策及管理方面的意见。但是研究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之后，其结果是产生了一门学科叫文化人类学。人们发现通过研究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反而加深了对自己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所以文化人类学最早是从研究殖民地的文化开始，研究异文化开始，最后成为认识人类各种不同文化的一门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人们称之为理性时期，即进化论的时期。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文化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不仅有高低优劣之分，并且是不断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因此当时常用“原始社会”、“初民社会”“原始文化”、“蒙昧社会”等术语来形容与西方文化相异的文化及社会。

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为结构论时期。人们在深入研究各种有文字或无文字的社会、“高等”和“低等”文化后，发现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自己独立的体系，有自己的结构和机制。第三阶段为文化相对论时期，进入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文化相对论成为主流共识，认为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化，它都因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而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高明。正如我们不能说汉语就比藏语高明，也不能说某一个民族的服装比另一个民族的服装更先进。因为文化是不能横向作价值比较的，而应从一个文化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它的独特性和特殊价值。同时，我们也不能用自身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我们在认识一种异文化时，常常会犯一种错误：就是以自己的文化为参照和坐标，去评判另一种文化的高低、优劣，这种观点是狭隘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需要相互理解与沟通。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就是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如果我们依旧站在文化自我中心和种族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其他的民族文化，就不是一种科学态度。

回顾历史，在18、19世纪，西方坚持西方文明中心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全世界最文明、最高的文化，但今天西方已经放弃这种看法，开始尊重文化多样性。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了一个《世界文化报告》，提出当今世界的文化主题是“文化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今天随着物质文明的丰富，人们已经越来越从追求生存与安全转向了追求意义和价值。意义和价值来自哪里？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例子非常多，比如说在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原住民基本上都信仰基督教，但到了70年代，他们富裕起来后，几乎全都回归于自己的宗教了。他们发现如果自己富裕，但把自己的文化丢掉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黯然失色。

文化人类学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人们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认识自身的文化的。以个人来举例更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不和其他人接触，把自己孤立起来，便不可能认识自己，只有和别人交往，让别人成为你的镜子，才能认识自己。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的。人们要认识自己，一个主要途径就是超越自己，超越的途径就是认识“他者”。今天，文化人类学已成为西方综合性大学的一门基础课，主要是帮助人们怎样认识不同的文化，这非常重要。

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开教育部民族学学部会议，当时正值新疆7·5事件之后，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多民族，不同的文化在一块儿，但是我们的大学里却没有开设帮助大家如何认识不同文化的通识课，所以当时写了一个提案，建议教育部在我国综合性大学里开设文化人类学公共课，介绍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只有识别的文化，才能产生对照、自省和文化自觉，才能够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也才能够真正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我们很多内地的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文化背景里，很难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文化的特点。只有当我们出国或者来到边疆民族地区，接触到别的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才能够更清楚、更深入的认识自己文化的特点。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每个人也是通过你的社会关系、你的交往，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的特点。因此在不同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

的交往中，正确的态度便是从别人的文化中来反观自己的不足。

对待异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不能以自身的文化标准去判定别文化，这个是一个错误路径。更不能“以己之长比别人之短”。而要以别人的“长”来审视自己的“短”。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老是以自己的“长”来比别人的“短”，这个人就很难进步，他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总是在社会生活中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来对照自己的短处，他才能不断提高和进步。文化和民族也是这样。当今世界判定现代文明与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他是否有开放的文化态度。开放的文化态度就是首先要尊重异文化，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据我了解，在内地，因为汉族人口最多，又是主体民族，所以往往不自觉地有一种文化自我中心倾向，这是很错误的。真正的现代文明、现代人，应该是尊重异文化、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谐的基础是包容和开放的心灵、开放的文化态度。我们现在强调“和谐”，因为和谐才能产生稳定，而稳定的基础是要包容多样和差异。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和希望的世界一定是多样性的世界。

当今世界有两个东西相互形成反差，一是经济一体化，它带来全球一体化，但与此相对应的却不是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都在强调自身的文化传统、自身的文化价值，这和经济一体化相对应，二者相辅相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常给学习民族学、藏学的学生说，你们合不合格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树立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态度。我认为咱们做民族和文化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基本态度。大家知道，生物学上有一个定律叫生物多样性，其实文化也同样如此。很多年前，我在内蒙古考察时，途中在草原上停车休息，陪同我们的是现在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齐木德·道尔吉教授，我们看见他趴在草地上像找什么，好奇地问他，他说他在数草种，他说过去草原牧民判定草原好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一平方米之中有多少种草，过去可达到200种以上，是比较好的状态，现在只有三四十种，状态在恶化。以一平方米内草种的数量来判定草原的好坏，这是牧民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其实文化也是这样。文化的同质化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就像生物的同质化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一座山都是一种树种，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几十种、上百种树种就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文化也是这样，我常给学生说，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有各种不同文化的国家里是我们每个人的福分，我们能够充分享受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多彩与丰富。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平时看不见或意识不到，但是一旦这些没有了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很可怕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如何从高原地域环境来认识藏族的生活方式。

对我们从内地来到藏区的人，认识藏文化有两个根本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高原地域，因为内地是一个非高原地域，我们到藏区之后发现很多东西都和我们不太一样，包括习惯、衣食住行等等。如果我们缺乏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常识，就很容易用非高原地域的人的生活方式去评判高原地域，这就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另一个障碍是宗教信仰，内地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社会，几千年来我们是靠中央集权体制来形成主要凝聚核心，所以世俗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宗教未得到充分发育。生活在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的人到了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社会，他要认识这个社会就面临着障碍。比如我们内地常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在我们的价值观念里婚姻比信仰重要，但是这个话语放到藏区的社会环境就不太合适，它与当地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在藏族的文化观念里，信仰比婚姻的份量要重。我接触过一些从内地到西藏旅游的朋友，他们看到转经和朝圣的藏民把很多的钱、酥油等等都捐献到寺庙，觉得很惋惜，他们觉得剩余的产品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这就是世俗社会中的观念，觉得人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但是在西藏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内地人到了西藏往往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高原地域，另一个是宗教信仰，这是我们认识藏族和藏文化的两个障碍。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自省、自觉。

我们先来看一看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我国版图里面占了很大一块，将近四分之一。从世界范围来说，主要有三大高原：一个是南美高原，平均海拔在3800米左右；还有一个是东非高原，它要低一些，2000多米；还有一个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4500米。如

果把青藏高原放到世界范围来看，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因此，被称为“世界屋脊”或者“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它的北面是号称“亚洲脊梁”的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很长；它的西面和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面是巴颜喀拉山、祁连山、唐古拉山等等，所以它是被周围巨大的山脉环绕的一个地理单元。

青藏高原的面积是 2900 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藏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当然青藏高原除藏族之外还生活着一些其他民族。藏族的分布范围和青藏高原的范围大体上是重合的。我们在四川藏区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和藏族交错而居、比邻而居的还有其它一些西南民族，但是一旦到了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区域，基本上就是藏族生活的地方。所以藏族主要居住于高原地域，如果要给藏族一个定位，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地域民族。由于青藏高原的唯一性，也决定了藏族及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

我有一个经历，90 年代中期我来拉萨，我坐大昭寺外面的台阶上休息，旁边有一位法国来的小伙子，他能说点中文，我问他为什么来西藏。他说：“我来西藏很简单，主要是想看一看在世界上最高地方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想些什么。”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也让我意识到高原地域特点应该是藏族同其他民族相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藏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因为从藏族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才能了解到世界上海拔最高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只有从藏文化里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国 56 个民族中藏族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的中华文化是很有特色的，藏族文化给中华文化这个庞大体系增添了很多特色，这是藏族文化非常值得自豪的一点。在文学作品里，藏族常被描写为“离天最近”、“离太阳最近”，这看似很浪漫，但大家同时应该意识到一个事实，高原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比较严酷的环境。我们来到这个环境里，首先是“高”，气压低，然后缺氧，温差非常大，空气里的含氧量通常只有内地的一半，一些高海拔地区可能更低。过去从外面进为藏的人，在他们写的游记里，很不理解一个事，他们到了高海拔的山口，就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头发晕，嘴唇发乌。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们认为是在“瘴气”作怪，“瘴气”看不见，所以经常在山上，人看着看着就不行了。

青藏高原有很多地方是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唐书·吐蕃传》中谈到吐蕃的环境时用一个词叫“物产寡薄”。今年七月份我从那曲去阿里，穿越羌塘高原，完全是无人区，道路也不明显，经常走错路，要问路也根本找不到人。包括三江源、可可西里这些地方很多都是柳宗元所描绘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景象。所以青藏高原很多地方地旷人稀，是自然条件所限，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地方对人类而言，并不是适宜生存之地。但千百年来，藏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息繁衍，并创造了他们厚重而独特的文化。

如何理解藏族文化？如果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藏族的文化即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了适应高原环境而产生的一套生存策略。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我简单举几个，比如说高原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藏族穿的半袖，到了正午时脱一只袖子，这是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衣着，还有很多帽子、头饰等等，这些都是为了适应高原环境。另外，我们知道在拉萨，七八十度水就开了，饭是煮不熟的，过去没有高压锅，所以藏族人很智慧的把青稞炒熟后磨成面，就可以解决熟食的问题，不会长期吃夹生的东西，而且很便利，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茶、酥油，和着就可以吃。而且他主要吃牛羊肉、茶。过去藏区没有蔬菜，我 90 年代初进来，当时菜比肉贵。但现在在城市这些地方，蔬菜已经极大的丰富。而过去人们主要靠茶、酥油、牛羊肉、糌粑这几种。牧区的人除了牛羊肉还要吃糌粑，农区需要酥油和牛羊肉，所以藏族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牧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结合。过去藏北同拉萨、山南之间有盐粮交换，主要就是牧区的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粮食，这就使牧区和农区结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农、牧的结合是藏族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

一般说，在藏区没有纯粹的农区，但是有纯粹的牧区，牧区为了解决粮食和糌粑的问题，就形成了交换。农区和牧区产品的交换几千年都在进行，今天也是这样。从住来看，农区是石砌、平顶，房屋较高大；牧区因为很冷，风大，所以用很厚的土坯墙，房屋低矮，较抗风。青藏高原的行过去主要靠牦牛，过河是牛皮筏子，都和高原的生态环境相适应。大家可能注意到，藏传佛教不禁止肉食，大多数佛教都吃素，但藏传佛教不吃素。因为高海拔和高寒的环境，人的热量的消耗很大。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高热量的食物是很难生存的。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材料，说西藏的高僧活佛到印度后，接触到了其他一些宗教领袖，见他们都吃素，于是也尝试着吃素，吃了一段时间的素，结果大病一场。原因是他们的体质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环境，突然改变饮食结构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有两个例子最能体现高原适应，一个是牦牛，青藏高原牧区对牦牛的依赖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所以拉萨城内的牦牛雕塑被称为“高原之宝”，有的把它称为“高原之魂”。牦牛是高海拔地区的一种生物品种，它在夏季的活动地域可以达到海拔 5000 到 6000 米，直抵雪线之下。它对高原环境的适应力无与伦比，它耐寒耐、饥耐渴，而且是高原上最好的交通工具，牦牛也是藏族在高海拔地区赖以生存的重要生物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高海拔的牧区，特别是 4000 米以上的区域，牧民们的衣、食、住、行都无不和牦牛有关。人们吃的是牦牛的奶制的酥油、牦牛肉，住的是牦牛（毛编织）的帐篷，行也是靠牦牛，盛物的口袋、绳子都是牦牛皮制成，煮食和取暖靠的是牦牛的粪。人们依靠牦牛在那个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自然循环，牧草滋养牦牛，人又依赖于牦牛来生存。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循环。在农区，牦牛也是耕地能手。所以从青藏高原牧区，也包括农区，藏人生活对于牦牛的依赖程度，可以看到他们适应了高原，和某些物种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离开这个物种，几乎很难在那里生存。所以从牦牛这样一个坚韧顽强的生物品种可以体会到藏人在高海拔地区为什么能够创造出的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

还有一点就是天葬。从世界范围来看，天葬可能是最为独特的葬式。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如何对待生和死往往关涉其文化核心，也最能体现这种文化的生命态度和人生价值观。青藏高原最早并不是天葬，在新石器时期，拉萨曲贡遗址已经发现石棺葬，由石头和石板垒起来的墓葬。川西高原一带，在东汉以前至春秋战国时期也普遍是石棺葬，当时石棺葬的成本是很高的。墓地周围不一定有石头，要从很远的地方搬来，把石块切成板状，成本非常高。到了吐蕃时期，主要还是实行土葬，但是到了吐蕃后期就开始变化，吐蕃以后基本上就是天葬为主，当然还有其它的火葬、水葬、树葬等等，但以天葬为主。天葬的观念，从文化上解释就是，在藏族的观念里，和躯体相比人们更看重人的灵魂，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很超脱很释然的方式选择了天葬，同时也通过天葬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上去。天葬蕴含了一种对生命的很释然的态度，一种洒脱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天人合一”这一观念，这是古代华夏地区人们追求的一种境界。但是，我认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藏族文化是最天人合一的，因为在最高海拔的地方生存，人必须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什么选择天葬，还有一个自然环境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看，天葬也是环境适应的一种选择。从地理条件上讲，高海拔地区基本没有树木，也缺乏木材。到了冬季，土根本挖不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和这样的环境相匹配的丧葬方式。所以从自然环境来说，天葬不仅是最绿色，而且也是和环境最融洽的一种葬式，是藏族经历多种文化选择之后找到的最合理、最能和环境融洽、匹配的葬式。其中既有自然适应的因素，也有文化选择的因素。

藏族的分布地区存在比较大的地域差异。藏族分布地区传统上分为三个版块，即卫藏、安多和康。它们既是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单元。这种地域差异给藏族文化带来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藏文史籍里面很早就形成这样一种说法，卫藏是法区，其特色是宗教，所以拉萨被称为圣地，所有藏区朝圣都要到这里来，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安多是马区，也就是说安多的特色是马，是牧业；康这个区域是人区。藏族谚语里面还称卫藏人热心宗教，康巴人好斗，安

多人会做生意，这些谚语都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区域差异。在 20 世纪上半叶有几个德国人类学家，他们对藏族做了 60 多例体质测量，测量的结果他们把藏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藏 A 型，以卫藏为中心，主要是短头型、面孔宽、身材较矮，他们也把藏 A 型称作“僧侣型”；另外一种为藏 B 型，又称为“武士型”，主要在安多和康这一带，是长头型、面孔相对较窄、身材高大。所以，三个区域在体质物征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卫藏因为地处一江两河（指雅鲁藏布江和年楚河、拉萨河），非常富庶，几千年来都是高原农业的高产区，所以在人的体质特征上和其它牧区、康区的情况上就产生了不同的特点。

第三个问题，从高原环境认识藏族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

藏族社会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吐蕃时期，是一个王权社会，王权至上。吐蕃时期传了十代赞普，在吐蕃之前也传了 31 代赞普，那个社会里面是王权高于一切。但是在公元 10 世纪以后一直到民改以前，西藏的社会主要是宗教性的社会。为什么说它是宗教性的社会呢，因为在公元 10 世纪到民改前这个阶段，宗教组织是藏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元代的时候，阔端派了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多达那波，蒙古人很自信自己的铁骑，所向披靡的蒙古军队征服了欧亚大陆，所以对西藏也很自信，他就派了他的将军和军队打进来，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地旷人稀，除了寺庙没什么东西。蒙古人意识到，要用军事征服的手段用征服这个地方的价值不大，必须要改变策略，所以他退了出去。说明宗教组织是最基本的一种社会组织，宗教也是社会的主要凝聚力。藏族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内地很不一样，内地是靠中央集权的政权把非常广大的区域和人民凝聚起来。藏区那样地旷人稀，它靠的什么，就是靠宗教来凝聚，而且政治上形成了政教合一模式，也就是说从公元 10 世纪以后，西藏所有地方政权都是以某一教派为依托和载体来产生。藏传佛教是藏族的主要信仰体系，他由两个信仰体系糅合而成，一个是藏地本土的信仰体系，就是苯教；另一个是从印度和中原两个方向传入的佛教。《土观宗教源流》中对佛教与苯教的关系有这样的阐释，叫“佛中参苯，苯中参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藏传佛教是充分吸收了藏地本土的信仰、文化和很多因素而形成的佛教体系，而且是用藏语文来传播。如果更简明地理解，可以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藏”化了的佛教，或者说是本土化的佛教。

如果把藏传佛教放在一个较大的范围里看，他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是形成了活佛转世，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除了达赖、班禅之外还有很多活佛转世的系统，这在其它宗教里面没有，只有藏传佛教有。另一个就是密教的特点，佛教认为人的成佛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习佛学的经典，皓首穷经，通过对经典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来达到成佛的途径，这个途径叫“显”；还有一个途径叫“密”，认为释迦牟尼的法身遗留了奥秘大法，也称为“真言”或称“金刚乘”，念诵此真言，用心、口、意把这个真言融合起来而且不断地修持，人也可以达到成佛的途径，这就是“密”，藏传佛教各教派都有密教的特点。在唐代，密教曾通过西藏、中原一直传到日本。密教在藏传佛教里保留最完整，日本的佛教中也有保留一些密教的东西，称为东密，藏传佛教称为西密。

另一个特点是藏传佛教形成了众多教派，教派中又形成很多支系，特别是噶举派，有“四大八小”的分支。藏传佛教的各教派，我们内地的人很容易从自己的文化观对它作出理解，在藏文史籍里讲到一个事情：元代的时候，八思巴成为帝师，忽必烈很信任他，给了他一个提议说：“西藏那么多教派不太好管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独尊萨迦派，把其它教派都予以取缔。”但是八思巴婉言谢绝，他说：“我们虽有不同教派，主要是传承不一样，对佛学原理的某些理解不一样，但是各教派的关系就如同一只手的不同手指，如果去掉任何一个手指，都会对手造成伤害。”所以藏传佛教的教派不像有些宗教教派那样是水火不容，它不是这样，除了传承不一样外彼此在横向都有许多交流。如宗喀巴在创立黄教时，就曾师从各教派的高僧学习各个教派之长，然后来创立了格鲁派。另外就是基层社区是以寺院为中心来形成的，这和世俗社会也不太一样的，所以宗教也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

苯教是藏地最古老的自然宗教，也称为民间宗教，它的一个特点是“万物有灵”。藏文史籍记载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一直到松赞干布之前，都是以苯教治国。苯教的发展分三个阶段：一是最早存在于藏地本土的各种原始宗教，称“笃苯”；二是从象雄时代起吸取了很多外来因素特别是湿婆教因素而逐渐系统化的苯教，叫“伽苯”；三是佛教传入后吸收了很多佛教因素而形成的苯教，称为“觉苯”，也就是今天的寺院苯教。现在藏区各地还有很多苯教寺院，这些苯教寺院都吸收了佛教的很多东西。同时，佛教也吸收了苯教的很多东西，如玛尼堆、经幡、神山圣湖的信仰，万物有灵，这些都源于苯教。存在于民间的许多自然信仰也属于苯教。

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藏族社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民信教的宗教性社会，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怎么认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藏传佛教是和苯教、本土的文化信仰充分糅合之后形成的一个新的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有两个最突出作用：第一是减少了人口增殖。在过去传统社会中，藏族家庭中有两兄弟必有一个到寺院出家为僧，有三兄弟者必有须两人出家，这产生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增殖大幅度下降。这个方面藏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大家形成一种共识，藏族的人口在很多阶段都非常低，民改前西藏人口大概百万左右，到了民改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由于物质生活的富裕才有了根本的改善。

藏族传统社会人口增殖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为什么这样？其实和藏传佛教的关系非常大，其结果就是使人口数量能够和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匹配。过去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青藏高原人口如果过量繁殖的话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实际上这是通过文化机制来达到人和自然的一种平衡。藏传佛教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减少人的物质欲望。我们知道吐蕃时期是青藏高原最强盛的时期，吐蕃王朝基本上把整个青藏高原都占下来了而且强盛无比。但是吐蕃王朝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始终不断向外扩张，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周边掠夺财富。只有从周边获得大量财富，才能够维持一个强盛的王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吐蕃王朝要一直持续下去这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它不可能一直持续向周边掠夺，其次持续向外扩张掠夺可能招致周边文明的毁灭性打击。所以青藏高原这个区域要按照一个世俗化社会追求财富、追求强盛的目标来长期和持续发展，具有不可能性。因为物产寡薄，生态非常脆弱，地旷人稀，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欲望一定要得到控制。

最后是靠什么来控制，在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就是靠藏传佛教。因为佛教是重来世、轻现世，重信仰、轻物质，所以上千年来使人的物质欲望、生活状态和高原环境相匹配。内地的旅游者常感叹藏民把大量的剩余财富捐给寺院很可惜，认为应该用剩余财富来扩大再生产。在高原牧区很多地方，如果按货币价值来衡量，一户人几十上百头牦牛，数百头羊，再加上挖虫草的收入，他们可以算得上很富裕。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要在当地生存只能过那种传统的、简单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要在海拔 4000 多米且地旷人稀的区域生存，如果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物质享受、功名利禄，对物质的欲望很强，就不可能在那里生存下来，只有逃离那个地方才可能实现这些愿望。所以一旦要在那个地方呆下来，就只能按照那个地方的传统方式，而且必须要有信仰。人要高海拔地方生存，必须要有信仰。因为人在那里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必须有信仰来作为生活的支撑，所以减少人的欲望是藏传佛教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使藏族在不太适宜人类生存的高海拔地区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把他们的文明延续下来，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and 生存策略。

另一方面，藏族社会能凝聚成一个整体也是靠藏传佛教。在川西高原一带，过去有很多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先是被吐蕃征服，后来大多信奉了藏传佛教，由于藏传佛教是靠藏文来传播，佛经等都是藏文，所以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藏文化圈也不断扩大，藏族在青藏高原整体的凝聚正是通过藏传佛教来完成的。还有一点就是学术界有人对西藏传统社会特点的总结，叫“大宗教、小政府”。

在 20 世纪上半叶，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人员也就 300 至 500 人，才三五百人的官员体系管

理这么大的地域，政府是一个小政府，一个低成本政府。而且派到各个宗也就几个官员，人也不多，原因在于寺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控制系统。上世纪 90 年代，一位德国哲学家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现代人类社会的管理成本越来越高，职能划分越来越细，机构越来越多，造成很大浪费，他提出应当提升一些社会组织或宗教组织来和政府组织相并列，把政府组织的职能分掉一部分，这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民改以前西藏就是一个“大宗教”、“小政府”的社会，社会管理成本很低。藏传佛教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道德约束力量，所有宗教都是一个道德体系，让人们自觉地遵守一些行为规范和礼仪。内地因为不是全民信教的社会，所以政府需要不断作一些道德方面的提倡，来弥补道德的缺失和教育的不足。一个正常社会是需要道德来维系

的。

在藏族的信仰体系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是藏文化中非常独特的一个东西。在藏文化中，特别是民间的信仰体系中，对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十分突出，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这是藏族文化观念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这同样也是适应青藏高原特殊而脆弱的生态环境的一种策略。我在阿里听到对天葬的一种解释，当地老百姓说，我们为什么要把亲人的遗体用来喂鹰，是因为我们不想让鹰吃地上的动物。因为藏人不杀生的，这是他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包含了对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独特理解。

在藏人眼里，大部分的山都是神山，大部分的湖都是神湖。我在川西高原做调查时发现，神山是庞大的体系，比如小一点的山，如村庄附近的山可能是一户或几户人的神山，大一点山就是更大区域的神山，那些高耸入云、终年积雪不化的山往往是整个更大区域的神山。神山信仰非常古老，可能是藏地最古老的一个信仰体系。最初，居住在一定区域的人们因共同信仰某一座神山而产生相互的认同，从而也共同享有神山周围的资源，并把不信仰神山的人排斥在外。这可能是神山信仰最古老的功能。从今天世界范围来看，藏族的对神山、圣湖的信仰与崇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现代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藏族仍然保留了亦步亦趋叩长头转神山、圣湖的习俗，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当今人类自然膜拜的一种极致。

为什么青藏高原的藏族对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极致的崇拜？我认为，这种对自然的高度敬畏和遵从，是藏人祖祖辈辈在青藏高原这个人类极限地区生活所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经验。一些不了解藏文化的旅游者可能会从“愚昧、迷信”来理解这种现象，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在那么脆弱的环境下，人一定要和自然环境之间保持一种高度的协调，对自然的敬畏和遵从正是为了达成这样的协调。所以，藏文化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蕴含着对青藏高原地理及生态环境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凝聚着这个文化很高超的智慧。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经济大潮不断波及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开矿引发一些风波，当地老百姓说那是我们的神山，不能动，开矿给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带来破坏，特别是牧区，一是造成草原上地下水位下降，二是草皮一旦毁掉就再也长不起来。可喜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已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在藏区随意开矿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

1998 年长江上游天然林禁伐之前，甘孜州、阿坝州砍了很多树木，那些原始森林一旦砍掉就再也恢复不起来，随便你怎么种植。现在人们终于意识到那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旦把树木、植物破坏掉，今后对整个长江下游将是灾难性的后果。藏族是用千年百积淀下来的文化经验和智慧保护着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最近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概括了我国民族地区的四个共性特征，即“生态屏障区”、“水系源头区”、“文化特色区”、“资源富集区”。这是非常准确的界定和定位。可以说，青藏高原作为一个民族地区，在前三点上尤为典型和突出。青藏高原号称“中华水塔”，几千年来孕育和滋养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两条母亲河长江、黄河都从这里发源。中国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四条河流都从这里出去。三江源现在成为那么大一个保护区，就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去被我们所忽视的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东西，今后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是最最重要的。水、空气将是未来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东西。藏族用他们的文化智慧，用他们的信仰把这些东西很好地保护下来。

第四个问题，谈谈藏族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性格。

如果要归纳藏文化的特点，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高原地域特点，一个是宗教文化特点，这是藏族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我说这个情况可能在广大农牧区体现更充分。当前藏区出现了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城乡的两极分化加大。城市发展变化很快，文化变化大，但就广大农牧区来说，基本的价值观念仍然得以保留。第一个就是轻物质、重信仰。藏族的文化性格里，虔诚、执着、坚韧、约己这些品格，都和信仰有关，是信仰所铸就。我曾在四川最大的牧区县石渠色须寺遇到过一个情景，我们进去的时候活佛刚刚出现，很多信众那种虔诚的目光着实让人震撼，在城市社会中很少看到那样的目光。由于藏传佛教信仰使人们带重来世、轻现世，所以藏族的文化性格非常能够忍辱负重，很能吃苦，当然这也是造成他们的财富观念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要淡薄。

藏人有一点和汉人很不一样，就是不太重积蓄。我们内地的人一有钱就积蓄起来，过去的很多地主、财主都是靠省吃俭用积蓄出来的，今天我们也把省下的钱都积蓄起来存到银行里。但藏族不是这样，他们把多余的东西要么让周围的人分享，要么供给寺庙。我曾和藏族著名学者西藏社科院的巴桑旺堆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用了一个很准确的词，说藏族是“刚够就好”。比如过去乞丐去乞讨，只要上午乞讨够一天所用，下午他就不去了，他会去从事他自己的活动，比如去甜茶馆啊等等。所以藏人的商业观念也相对淡薄。我前年到松潘去，去黄龙、九寨沟都要经过松潘一带，松潘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三分之二是藏族，其余的是汉族和回族。过去主要是回族经商，后来因为旅游发展，利益蛋糕越来越大，汉人和回族都经商，现在这个“蛋糕”更大了之后，藏人也开始经商，但他们的经商能力远不如回族和汉族，在这个背景下，藏族与回、汉之间的矛盾就增加了。所以藏族由于信仰和高原适应的关系，他们商业观念是相对淡薄的。

藏族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类似我们说的“国民性”，是由整体文化带给一个民族的共同性格，我觉得大体有这么一些：因为佛教让人向善（所有三大宗教根本都是让人向善），藏族由于佛教信仰很深，所以向善也成为藏族的文化性格。安多和康等藏区都要去拉萨朝圣，能到拉萨朝圣是僧人和信众一生的理想和向往，但是过去朝圣带不了多少东西，就背一小袋糌粑，带点酥油，途中的生存主要靠化缘，朝圣者经过沿途村庄，家家户户都会拿出东西来接济他，这是一个传统，所以行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由于长期信仰佛教，我认为，藏族整体上性格比较温和，比较忍辱负重，也比较宽容。而且另一点就是遵守规则。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藏族老年人组成的旅游团到北京参观，导游带他们到了预订的宾馆，但那个宾馆说情况有变无法安排，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比较远的宾馆，这些藏族老人刚刚到达那个宾馆，原来预订的宾馆又突然通知说可以安排他们了，于是导游又领着他们回到最初预订的宾馆，整个过程折腾了不少时间，这些藏族老人把行李搬下搬上，非常安静，非常听话，没有任何人发出怨言和表现不满，这让导游异常吃惊，是她带团经历中从未有过的，不由得对这些藏族老人的宽容大度肃然起敬。其实这种善解人意，温和、宽厚，都和他们的信仰有关。

藏族的文化性格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神性思维，我认为这是藏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1991年我来拉萨开一个藏学会，会后组织到堆龙德庆县参观，在村子里我看到家家户户都挂领袖像，有华国锋主席，有毛主席，也有邓小平，但是都有华主席。我觉得很奇怪，问了一下，陪同的藏族人告诉我，在拉萨一带藏族对华主席的崇敬已经成为一个现象。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华主席做第一书记时，曾来过西藏，进藏前他问西藏需要什么，当时的拉萨还没有自来水，市民要到拉萨河背水，用的是木桶，木桶自重大，水也容易洒，当时刚刚有了很轻便的那种加仑桶，很轻便、水又不洒。西藏方面就汇报了这一情况。华主席进藏时就带来很多加仑桶来，分给家家户户，拉萨老百姓就牢牢记住了这件事，并把加仑桶称作“华主席”，产生了一种神性的思维，所以拉萨一带的老百姓就都挂华主席的像。毛主席在世时，西藏很多老百姓特别是翻身农奴还普遍把毛主席视为观世音菩萨的转世等等。藏人看很多东西是用一种神性的思维，不是世俗的

思维。

敬畏自然和善待动物也是藏文化里非常突出的特点。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来拉萨的时候，遍街都是狗，因为狗是藏族生活里最亲近的动物，他从来不杀狗，不吃狗肉，所以狗就自然繁殖，到处都是，这是善待动物。藏族有句谚语：“把你好的东西布施给水里和地上的动物”这是不求功利的，就是说我要善待动物。

还有就是藏族是很乐观豁达、幽默开朗的。我发现一个现象，我曾经问过华西医大从事心理学的专家，他说藏族吸毒的很少，在西南某些民族中，贩毒、吸毒已经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信藏传佛教，藏区没有出现吸毒的问题。藏族中产生心理问题的比较少，特别是和内地比较非常少。因为比较乐观豁达，在那么一个高海拔的地区生活，一定有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心态。

另外藏族文化很尊重老师，因为过去佛教的传承，首先要拜上师，密宗的传承也一定要拜上师，不是大家坐在一起公开讲课，而是上师考察跟随自己多年的弟子，觉得你可以了，才将佛法传授给你。尊师的传统是藏族优良的传统。我接触过不少藏族的精英人士，他们中一些人已做了很重要的大学校长，我去过他们的家乡，也到过他们的老屋，你很难想象他们的家乡是在那么大的山沟里，交通那么封闭，而他出来之后能够发展得那么优秀。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定是厚重的文化和高原环境给了他们很多滋养。我们读藏文史籍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它可能比较忽略时间、地点，但是那个故事一定会非常生动。我觉得很多藏族高僧大德的思维都有一种童心在里面，是一种很彻底的单纯。

藏族文化博大精深，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有一次带着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研究团队，那些人到了一个村子，他们选择最传统的一个家庭，包括他的房屋可能是上百年的房屋，然后他们几个人就把房屋完整地测量然后把它绘制出来，第二就把四季的农事全部详细地记录下来，第三就是把他们的婚丧嫁娶包括年纪详细记录下来，他们想保留这个微观的文化，是很高明的团队，我们和他们合作了几年，有一次我们带他们在岷江上游跑了很多羌寨地方，后来来到了米亚罗嘉绒藏族地方，他们一走进一个很一般的藏族家庭里，看到金碧辉煌的客厅，那个教授非常感慨，他说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到藏族的文化确实是令人敬畏的，当然他主要是从宗教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是产生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甘珠尔》里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智慧，所以我认为藏族的文化是需要我们一点一滴逐步深入的体味和认识的。

藏族其实是很温和、很单纯、很容易亲近的。我有一个女学生，很多年以前她们几个女生一起到康定县塔公寺，在草原的边上，那个地方都是康巴汉子，头上挂着红头绳，看着体格非常高大，她们一接近后，发现那些人其实很好打交道，你问他什么都很热情，而且乐于助人。他们不像表面上，如果你没和他们接触，看着好像很恐怖，其实他们是很单纯的民族。当然另一点就是文化实际上是动态和变化的，变化是文化的常态。藏族文化特点和现代性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和调适，特别是现在的藏区，城乡二元体系非常明显，城市和农牧区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城市里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传进来开始影响到藏族，但是从民族的整体和文化来看，农牧区基本的价值观、信仰和高原适应的生活方式都保留了下来。

我认为藏文化中有很多后现代的因素，“后现代”是针对现代的极度发展出现了诸多弊端而产生的一种反思性思潮，如现代发展太注重技术，如过于强调人类自我中心，对自然较为忽视等等。后现代更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而这些东西在藏文化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2006 年，《中国国家地理》的执行总编单之蔷让我给他们的栏目就藏族的宗教信仰写一段话，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藏族信仰对我们的启示，在漫漫的朝圣路上，朝圣者的背影总给人无尽的启示，……面对高原的艰难环境，信仰支撑了他们的生活，也托起了他们的希望。于是，虔诚、执着、坚韧、宽容成为他们生存的性格与力量，而宗教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对藏族宗教信仰的理解。

最后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思考文化是什么。一般来说，民族就是不同的文化人群。文化是什么，我们从书本的定义可以简单说文化是指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但要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化，却需要观察和体验。文化通常由两个部分来构成，一个是生活的方式，二是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一般说，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前者是形而下，后者是形而上。其实，文化和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产生了什么样的生计方式，什么样的生计方式产生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一套价值观念。所以文化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策略和智慧。

美国学者哈维兰编的《文化人类学》（这是美国大学采用的人类学教材）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我觉得非常精辟，他说，文化是能够给拥有该文化的人群带来最大幸福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就是说藏族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是因为它们能够给藏族带来最大的幸福感。人类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没有一种文化是不能与别文化相互沟通的，所有文化之间都能够相互沟通。为什么？文化人类学对人类文化有四个基本判断：第一，文化相对，文化之间彼此没有高、下之分；第二，伦理互通，在所有不同的文化中人类的基本伦理都是相通的，比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等，第三，历史特殊。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轨迹都不一样。第四，人性普同。所以尽管文化不同，但人性是相同的，基于人性的人类伦理也是互通的，所以，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相互沟通。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数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和进一步，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这也是人类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

现在最新的分子生物技术就从基因方面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已经取得重大突破，结论是，今天地球人类的祖先是在 15-20 万年前从东非大峡谷走出来，然后逐渐扩散于全球。也就是说，今天的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川大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生物环境专家，在兰州大学做过副校长，曾在中国驻德国使馆做过文化参赞，我曾请教他人类起源的新观点能否成立，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大熊猫这个生物品种非常古老，是恐龙时代就有的物种，今天只在青藏高原东缘地带保留，但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尼泊尔一带也有很少量的大熊猫，生物学界做了一个试验，把青藏高原东缘和喜马拉雅南麓的大熊猫进行交配，发现二者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了。本来是一个物种，但在青藏高原隆起后就分开了，现在交配已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今天的地球人类，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只要交配都能够繁衍后代。人类共同的历史不过 15-20 万年，所以人性是普同的，人类的不同文化都是环境适应、社会适应的结果，是后来才发生分化的。尽管人们的文化不同，但人性是相同的。因此所有的文化都可以沟通。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文化态度，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和多元共存”已成为一个主题，面对这样的主题，我们应该采取的就是正确的文化态度，不是以自我的文化为中心来评判和否定别人，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尊重异文化，认识和理解异文化，并从别文化中学习长处来丰富自己。

最后我想用费孝通先生有关人类如何看待异文化的 16 个字来结束我的讲演。费孝通先生这 16 个字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各美其美”，是说我们每一种文化都不能妄自菲薄，要以自己的文化为骄傲、为自豪，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都能给拥有这个文化的人带来幸福感，带来快乐。所以要“各美其美”，第一个“美”是动词，我们都要重视自己的文化。第二句“美人之美”，是说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要“美人之美”，能在别的文化里发现我们自己文化中不存在的那些好的东西，认识和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应是我们对于文化的基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和谐就是“和”而“不同”。《国语·郑语》中有句话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说“和谐”则万物生长繁衍，“同”即追求一致则万物就不能发展延续。大家知道，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是和声，“和声”是不同的声音按照规律协调后而发

出来的，所以“和而不同”应该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文化绝不会向经济一体化那样会越来越同质化，我们过去接受的观念认为民族会消亡，这不一定是正确的看法。我们今天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在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然文化是变化的，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在变。文化变化的策略是朝着对拥有该文化的人群有利的方向来变。因此，面对文化的变化，我们也应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所以，凡是我们在工作、生活、学习上涉及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我们要采取的正确态度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既“各美其美”，又能“美人之美”。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只有采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开放文化态度，才能增进民族情感和民族团结，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创造民族和谐局面。这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由于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人数最多，大汉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总是在很多领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所以，对于我们汉族来说，尤其要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态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